

空間、現地、性情—— 屠隆馳馬入京所呈現的晚明側面

簡錦松*

(收稿日期：105 年 6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期：105 年 9 月 30 日)

提要

屠隆是晚明形象的先期人物之一，本文以大運河現地研究為基礎，在精準的旅行路線與日程的條件上，針對屠隆在萬曆 11 年 7 月，以 18 天的極短時間（16 個工作天）從丹陽吳大帝陵口馳馬進入北京之事，解說其行程始末。明人往來北京與江南，多由大運河舟行，而屠隆多次捨舟就陸，單騎先馳，尤以本次的高速紀錄，在所知的明人旅行中，從無先例。經由本項考察，可以發現屠隆的人格形象特質，為晚明文人與文學研究，提供一個嶄新而翔實的參考範例。

關鍵詞：屠隆、明代大運河、空間意識、現地研究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系教授兼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在晚明文人特徵中，「驚奇」二字，極有意思，不單單是《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二書以「驚奇」為名，閱讀各家文集，也經常會發現一些大小驚奇。但是，像屠隆在萬曆 11 年 7 月上京就職禮部主事時，從丹陽吳大帝陵口捨舟就陸，只用了 18 天，就沿著大運河的平行陸路，馳馬入北京，以明代記程書籍計算，單程 2525 明里，以今日公路計算約 1266.8 公里。這樣的快速旅行，不但需要有奇氣，還需要有體力，在晚明不作第二人想，這就不僅僅是剎那的驚奇而已，也可說是屠隆一生展現活動力的最高峰。

屠隆（1543-1605），字長卿，又字緯真，號赤水，別號玄同子、廣桑子、溟滓子、冥寥子、弢光氏。著作以《由拳集》、《白榆集》、《栖真館集》、《鴻苞》為主，《由拳集》、《白榆集》作於萬曆 12 年自禮部主事罷官前，《栖真館集》則跨於罷官前後，都是詩文集。《鴻苞》作於罷官以後，卷帙最多，內容龐雜，有三教，有輿地，有史論，有書信，有雜論、雜記。¹由於罷官對屠隆影響極鉅，後期所作文字雖數倍於前，但氣局趣味，兩俱不逮。

屠隆一生中有八次南北長途旅行，其中六次往返於北京和江南。這八次旅行包含從屠隆入京、中試、仕宦、生子、結友，到被削籍斥歸，歷經了他生命中的最高潮和最低潮，同時也正好是屠隆的壯年時期。北京和江南之間的交通，主要的動線是大運河，副線是與運河平行的陸路。江南人士習慣於行舟，多數選擇大運河。而且，由實證得知，屠隆對大運河航程及平行陸路的知識都非常充分，可是，他多次採行陸路，不隨眾人所好，尤以萬曆 11 年 7 月這次上京之役為最，這就是本文的研究主題所在。

空間意識、現地觀照、旅人性情，三者之間的關係，常常被論者忽略。其實，一個人面對長途旅行時，不僅僅是身體在移動而已，空間意識也引導著身體的行為。他必須隨時判斷，如何應對所處的現地，直到抵達目的地為止。在不斷發生的空間變換中，交通工具與行路現況的計算，風物氣象與身體感官的互動，空間的陌生與探索的欲求等等，各種心理活動相當複雜。本文希望藉由這次研究，切入屠隆內心的深層，也以此作為觀察晚明文人的一个重要側面。

全文將以四個步驟進行，首先，解說屠隆於萬曆 11 年 7 月由陵口馳馬入北京的始末，

¹ 《由拳集》、《白榆集》二種，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0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栖真館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鴻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8-89 冊。其他尚有《娑羅館清言二卷》、《娑羅館逸叢二卷》、《娑羅館清言一卷》、《冥寥子游二卷》、《考槃餘事四卷》等五種，皆收入《寶顏堂秘笈》正集第四冊、五冊、八冊（民國十二年文明書局印本），另有劇本《彩毫記》、《曇花記》（俱台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清代修補本）。

其二，證說屠隆務實的空間意識與路程知識。其三，分析屠隆性格中「放縱」的真義所在。其四，指出屠隆在乘船、肩輿、騎馬選擇背後的俠客情懷。

本文的基礎，是筆者近三年從事的明代大運河現地研究。至於其他學界前行者對屠隆的論著，以中國大陸為多，其所討論的內容，包括詩文作品、詩學理論、晚明風氣、三教思想、戲曲、茶說、交游、年譜等等。由於筆者是以現地研究方法進行，從基礎工作開始便與眾人的取徑不同，故未予評論和引用。此外，因文內不斷重複出現萬曆年號，為期文字省淨，特先列舉相關各年的西元對照表於下，內文從略。

表一 本文有關之中西曆對照表

萬曆3年	乙亥	1575年	萬曆4年	丙子	1576年	萬曆5年	丁丑	1577年	萬曆6年	戊寅	1578年
萬曆7年	己卯	1579年	萬曆8年	庚辰	1580年	萬曆9年	辛巳	1581年	萬曆10年	壬午	1582年
萬曆11年	癸未	1583年	萬曆12年	甲申	1584年	萬曆13年	乙酉	1585年	萬曆14年	丙戌	1585年

二、萬曆 11 年 7 月屠隆上京之役始末

本次上京之役的出發時間與在途經過，屠隆在〈與馮開之〉一書中曾作簡要的說明：

七月初旬，獨身從雲陽吳大帝陵口，舍舟而陸，日夜馳一百八、九十里，自陵口十有八日而抵都門，業隕牒期，法應坐，幸當事者見寬，而弟體中已罷甚，不復可支。²

抵達北京的日期，屠隆也明確記載為 8 月 9 日(1583/9/24)抵都門，12 日(1583/9/27)上任訖，見〈與劉觀察先生〉：

某以八月初九抵都門，十二日抵敝任，仰仗寵靈，長途無恙，顧以期促，單騎陸行，不及攜家。³

雲陽，是明南直隸丹陽縣的古名，吳大帝陵口是大運河碼頭，今陵口鎮尚有殘存古碑（位於31°57'2.46"北，119°40'6.04"東），距明代丹陽縣城約7公里。文中的「七月初旬」，是指

²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7a。

³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8b。

從屠隆家鄉寧波府鄞縣四明驛動身之日，並不是從吳大帝陵口舍舟登陸的時間。以當時四明驛到杭州省城的航運慣例推算，屠隆應於7月1日（1583/8/17）啟程，七夕當天抵達杭州，與顧養謙（字益卿，1537-1604）會面，並拜謁張佳胤（字肖甫，1527-1588）。顧養謙原任浙江右參議，已升山東按察副使，張佳胤原任浙江巡撫，萬曆11年閏2月陞任兵部左侍郎，但因杭州兵民暴亂之故，二人此時仍留在浙江善後。

屠隆何時從吳大帝陵口離開？如以抵達都門之日向前推算 18 天，應於 7 月 22 日開始走馬；至於舟抵陵口的時間，應在前一夜，即 7 月 21 日（1583/9/6）。

捨舟登陸之後，全部行程幾無停留，僅在徐州與友人姜仲文相見，見屠隆〈與姜仲文〉：

追維歇馬彭城，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言之心斷。⁴

姜仲文名士昌，丹陽人，姜寶之子，萬曆8年二甲進士第十一名，授戶部主事，分司徐州，監督漕運糧儲。⁵去歲屠隆上計時，兩人初次在徐州相見而論交，便匆匆而別。⁶這是第二次會面，從「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看來，兩人曾夜話至天明，由於熬夜體憊，次日不便騎馬；文中又有「連宵枕藉，累日沉冥」之句，可以推想他在徐州曾經兩夜，兩夜之中的這一個白天，兩人同遊戲馬臺（山頂姜士昌所題碑亭，位址為34°15'23.68"北，117°11'2.52"東）與放鶴亭（在雲龍山，位址為34°14'52.58"北，117°10'43.73"東），並作了詩。⁷這兩個景點都在徐州城的南門外不遠處，兩地的位址接近，戲馬臺頂到放鶴亭直線距離才1072米。徐州地面海拔高程約30米，戲馬臺頂約58米，放鶴亭約99米，因此，兩處登陟都不困難，半天就夠了。

以後，他經過東阿縣，又作〈東阿道中〉詩：

出郭易蕭蕭，空山共沲寥。秋陰生赤壁，寒色起黃茅。壞道盤松樹，枯流偃石橋。驅馳真吏事，不敢說魂銷。⁸

⁴ 屠隆：《白榆集》，文卷 11，頁 3a。信中說到董嗣成已經南歸養疾，應作於次年（萬曆 12 年）夏秋間。

⁵ 今戲馬臺最高處尚有姜士昌於萬曆十一年題字的碑亭。

⁶ 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文卷 5，頁 11a：「十二月初一日始抵彭城，……所謂項王戲馬臺及先主祠俱不及登。會丹陽姜仲文士昌以司農郎出為徐州權商使者，余甫下馬入逆旅，而仲父來。仲父，大司成姜公寶仲子，年纔弱冠，明潤如玉，人有俊才楚楚，與余為神交，一見驩甚。為余置酒徵歌，軟語款洽，寒暄徐益孫、郁承彬良至，洵一南國俊流也。臨分踟躕，定交而去。」

⁷ 屠隆：〈同姜仲文使君登子瞻黃樓矚眺〉、〈北上彭城別姜仲文二首〉，《白榆集》，詩卷 7，頁 4a、9b。

⁸ 屠隆：《由拳集》，卷 8，頁 27a。

首聯說出郭，次聯即城外風景，五句說道路，六句說石橋，都是沿途所經，末聯以馳驅之感作結。可見他是一邊走馬，一邊口占，並沒有耽擱。

丹陽吳大帝陵口到北京，以相當於明清驛道的現代公路計算，全程約 1266.8 公里。⁹扣去渡江、渡淮等待的時間共以半日計，再扣除停留徐州的一個整天，實際上移動中的日數，約僅 16.5 日，每日平均應走 76.78 公里，若以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計算，全程約 2525 明里，¹⁰日行 153 明里。

古代的長途騎馬旅行，日行百里已經是標準數了，¹¹超過這個標準，須有特別條件，如《清實錄》所載：

丁亥（四月十四日）諭大學士等，昨日皇子允禔奏：往祭華山，每日行一百七、八十里。逼近潼關，連兩三日，泥濘難行，一日止行百里。¹²

允禔（1672-1735）是康熙皇帝的長子，是年22歲，清廷重視皇子的馬術和武術，允禔想必十分壯健。他身為皇長子，又奉使代祭西嶽，沿途驛站必定從優準備馬匹，馬力必是一等的。明清的尺度與里法是相沿襲的，允禔每日所行的一百七、八十里，亦即屠隆當年的一百七、八十里。以屠隆的條件，絕不能與之相比，所以「日夜馳一百八、九十里」，應是誇大了，但他實際上每日所行的里數還是超過一百里甚多，艱苦之況，不難想見。

屠隆並非身長、體健、虬髯的大漢，他長得不高，外形女性化，因為過度喜好夜間活動，使得身體白皙柔弱，一如他所自述的：

⁹ 屠隆：〈與沈君典諸子·第三封〉，《由拳集》，卷 13，頁 18b：「不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北京，去歲間關抵家，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楊州，謁上官而歸，遂興此役。」文中「馳二千五百里」，指屠隆萬曆四年入京應試之行，本由大運河舟行，至邵伯湖口，水凍，迴船至揚州，改行陸路入京。本次由丹陽吳大帝陵口出發，距離更遠。

¹⁰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八卷》，（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66 冊。書中從丹陽到南京龍江驛的里程，是以城內驛站里數作紀錄的，因為屠隆從句容縣直接到江東驛，並未入城，所以必有誤差，須加「約」字。又，關於《一統路程圖記》之解說，請參閱註 41 至註 44 及相關正文。

¹¹ 清·崑岡等奉敕纂：〈吏部·處分例·驛遞·乾隆三十七年〉，《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98 冊，卷 118，頁 352：「其尋常派委人員。總以日行一百里為率。」本條派委的目的是新疆，條件是空身單騎，以日行百里為標準。宋·李燾：〈真宗乾興元年二月〉，《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98，頁 2274：「（寇準）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在此例中，日行百里已覺不堪。

¹² 清·朱軾等奉敕修：〈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三十二年（1693）四月十四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59，頁 745a。

某孱書生耳，纖瘦白皙，宛如弱女子。顧無朱亥之壯，而有要離之心。¹³

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夫僕亦大難相矣，將索之于形骸，則僕孱然六尺，白皙纖瘦，殊少丈夫之概。¹⁴

文中「則僕孱然六尺」，用《史記·張蒼傳》：「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為典故，¹⁵ 六尺已顯矮小，何況孱然。而且就如上引〈與馮開之〉書中所說，他才抵達北京就「體中已罷甚，不復可支」，到10月1日又染患感冒，臥床4日。可見他的身體並不是俠客者流。

以騎馬經驗來說，屠隆是四明人。江南交通以舟船為主，他的同鄉友人沈明臣（1518-1596）曾在〈謁征西將軍廟〉的詩序中，這樣形容馬匹：

嘉靖丙寅冬（45年，1566），同朱邦憲至宜興，偶過謁周將軍廟。時提督軍務都御史張公使人打碑廡下，縣官又具私馬數百蹄為驛以應部使者，臭穢不可入，謁罷，愴然退，與朱生各賦一詩以紀之。¹⁶

「提督軍務都御史張公」為張師載，是年11月，從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升任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人未至，先遣工至宜興縣打碑，為沈明臣所遇。¹⁷沈、屠兩人交情密近，沈明臣的「臭穢」之說，很值得參考。而且，屠隆本人並沒有提到少時曾受過精良的馬術訓練，在入京以前的詩文中，也沒有騎馬的經驗。

屠隆在這次高速馳馬入京前，曾有兩次陸行至北京的經驗，第一次是萬曆4年計偕入京，當日因為邵伯湖阻凍改由揚州陸行，途中不但有騎馬之事，又有高速馳行的紀錄，如〈北征記〉所云：

質明，冒雪北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大都莽蕩之野。¹⁸

不過，這次旅行從揚州到都門走了31天，每日行程，大多以一驛為度，約六、七十里。像

¹³ 屠隆：〈與顧益卿觀察〉，《白榆集》，文卷6，頁13a。

¹⁴ 屠隆：〈與李開府〉，《白榆集》，文卷6，頁8a。另外，屠隆：〈彭城歌贈姜使君仲文〉，《白榆集》，文卷2，頁24b，亦有「余也眇小文弱無所長」之句。

¹⁵ 漢·司馬遷：〈張蒼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96，頁2682。

¹⁶ 明·沈明臣：《豐對樓詩選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4冊，卷5，頁4b。

¹⁷ 明·張居正等奉敕撰：〈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六日〉，《明實錄·世宗實錄》，卷565，頁9050。又，宜興為南直所屬常州府下的一個縣，故稱其「提督軍務」官銜。

¹⁸ 屠隆：《由拳集》，卷18，頁15b-18a。

這樣的高速馳行，只發生在徐州到東平州之間，以及在河北涿州之時，並非常態。換言之，從一開始，高速馳行對屠隆而言，也是少有的經驗。

屠隆第二次長途陸行，是萬曆 10 年 11 月結束青浦知縣任期之後，赴京上計，到了丹陽吳大帝陵口，因為「水道阻塞，棄舟登陸」。在這次旅行中，他於 11 月 23 日（1582/12/17）自陵口出發，12 月 14 日（1583/1/7）抵都門，12 月 15 日（1583/1/8）入城，自陵口至都門，共陸行 22 日。扣去渡江、渡淮所需的時間，以半日計，又在界河驛流連止宿一日，在途約 20.5 日，平均一日須行 60.4 公里，速度已經很快了。¹⁹

萬曆 11 年 7 月的入京，和第二次長途陸行的路線完全相同，所使用的日數只相差四天，平均速度上也增加不多，但從 20.5 日縮短成 16.5 日，可能真的超過了屠隆的身體極限。屠隆為何要這樣趕路，他所說的理由是「業隃牒期，法應坐，幸當事者見寬」，所謂牒期，就是任官公文上所押注的報到程限，明太祖敕編的《大明律例》，對於官員赴任程限有如下規定：

凡已除官員，在京者，以除授日為始，在外者以領照會日為始，各依已定程限赴任。若無故過限者，一日笞一十，每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並附過還職。²⁰

據屠隆的說法，雖已超過程限，但得到監督官的寬免，想必超限不多。既知如此，何不提早出發呢？從他的書信中常看到：「抵家數日，即得儀部報。時有四壁在，不能治北行。遷延半歲，業罷棄雞肋物，勾吳故人聞而為治裝，始能入省。」²¹、「而某亦旋回儀曹之擢，自春徂夏，遷延在家。至七月初旬，促裝北上。」²²「得儀部報」便是「領照會」，可見他三月就知道了程限 98 天，²³另 50 天在家裝束假期。「勾吳故人」為無錫秦君陽，雖然他自稱缺少旅費，因而延誤時日，直到秦君陽贈金始得成行。可是，這並不是全部的

¹⁹ 見屠隆：〈發青谿記〉。又，行程中，至少有滁州道上一整天乘轎。

²⁰ 見明·朱元璋：〈吏律一·職制·官員赴任過限〉，《大明律例》（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刻本），卷 2，頁 23b。

²¹ 屠隆：〈再與子愿〉，《白榆集》，文卷 14，頁 4a。儀部即禮部，四壁在用司馬相如典故，即家徒四壁，勾吳公子為是梁谿（即無錫縣）富人秦君陽，入省，蓋明人稱六部郎為省郎。

²² 屠隆：〈與劉觀察先生〉，《白榆集》，文卷 9，頁 8b。

²³ 屠隆從四明到北京的赴任限期為 98 天。沈一貫：〈催三省考官揭帖〉，《敬事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3 冊，卷 13，57a，云：「查得赴任限期，浙江四千四百里，該八十八日。江西四千六百六十五里，該九十四日；湖廣三千二百里，該六十四日。」是以五十里為一日。屠隆籍在四明，據明·黃潤玉：〈驛程〉，《（成化）寧波府簡要志》（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第 174 冊，卷 3，頁 5b：「京師陸路四千五百五十里，水路四千六百三十八里。南路一千三百八十里，水路同；浙江布政使司，陸路四百八十里，水路同。」沈一貫文中所言浙江，即浙江布政使司所在的杭州，四明離杭州四百八十里，以五十里計，可得十日，則屠隆所收到之赴任期限應為九十八日。

原因。

從杭州到陵口不過 7 日水程。算一算，他從 7 月 1 日離家，七夕到杭州，如果只停留一天，7 月 9 日就從杭州發船，7 月 15 日可到吳大帝陵口，如果同樣 8 月 9 日抵京，就有 24 天可用，有這麼長的時間，他就有去年上計之行更寬裕的時間申申而往。現在，遲至 21 日才抵陵口，以致於後面的 18 天必須飛速馳驅。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據屠隆的自述：

在杭州有：「某之北上，辱明公相攜登吳山，望西泠六橋，把酒清言，遂至娓娓。」（報張肖甫大司馬）

在嘉興有：「攜李哭尊公罷，不見仁兄，心更折也。急趨而北，猶思道上握手，何意弟走鉅野，兄遵長河，東西相去，邈矣天涯。」（與馮開之）

在蘇州有：「七月北征，辱足下追之就李，又追之吳門虎丘，攜手連日夕。」（與陳廣野給諫）²⁴

從這三段引文得知，他在杭州、嘉興、蘇州都曾下船，在杭州與巡撫張佳胤（肖甫）同遊之後，到嘉興（古名就李），又上陸祭奠馮夢禎（開之）的父親，在此遇到來送行的陳與郊（廣野，1544-1610），兩人相攜到蘇州，作虎丘之遊後才告別。在給陳與郊的信上，雖然以「攜手連日夕」來形容，乃是指嘉興到蘇州的舟中相處，不是在蘇州繼續流連多日。因此，如果把嘉興奠祭、虎丘登臨各算一日的話，屠隆也不應該遲至 21 日才到陵口，可見他在杭州停留了 5 天。

杭州的停留酬應，是否一定需要 5 天？我們不是屠隆，不知道他的考量因素。但從客觀的形跡來看，我認為是屠隆對空間道里計算得太清楚，才使他大膽地做了這項決定。²⁵換言之，由於有萬曆 4 年從揚州到北京和萬曆 10 年從陵口到北京的兩次經驗，屠隆自認為能夠掌握這條路程，只須更少的日數便能趕到，才會把許多時間用在杭州的酬酢。所以，下一節裡，將深入討論屠隆的空間意識與路程知識。

²⁴ 三文分見屠隆：《白榆集》，文卷 9，頁 17b；文卷 9，頁 7a；文卷 12，頁 12a。

²⁵ 屠隆可以快速馳騁，馬匹供給是一大問題。讀者也許猜測，屠隆此行受到兵侍張肖甫的關照，因得驛馬之便。但他在前一年上計入京時，僅以知縣身分，也能維持不慢的速度，故本文對此點存而不論。

三、屠隆務實的空間意識與路程知識

東亞古典文學研究時，學者們對於文人筆下數據的精準程度，往往存疑，甚至有人根本忽視古人所提供的數據。我在處理屠隆著作時，便發現他在未第之前，已經讀過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和其他地理志書，撰成《輿圖要略二卷》，²⁶可見他很早就認識到九州輿地對讀書成學的重要關係。在明代大運河研究中，我曾分析過楊士奇、李東陽、吳寬、崔溥、文徵明、歸有光、屠隆、袁中道等人的大運河行記，發現他們都留心觀察所經的路況，特別是深入了解屠隆的八次南北旅行之後，更覺得屠隆有清楚的空間意識，對於沿途的水陸路線和里程，比旁人更為用心而了然於胸。下面我舉兩個事例為證：

（一）徐州至北京航行日數的計算

屠隆這次上京就禮部之任，為了爭取速度，乃單身就道。老母、長兄、岳父、妻子、兒女等八人，約定在一個多月以後的8月4日（1583/9/19）動身。²⁷一家人乘坐的是新任兵部左侍郎張佳胤（肖甫）提供的官船，²⁸在舒適和航速上都有保障。由於行駛路線是固定的，老婦少妻在舟，也不會胡亂停船應酬，所以時程可以預估。屠隆曾經三次計算她們到京的時間，一次是〈與劉觀察先生〉所說：

老母妻孥尚在後發，至今不得音問，未免懸勞。……家人後發，舟行又乏役夫，比從當事者覓得一郵符，而使小力馳至前途候之，十月中訂可得達北京矣。²⁹

這封信中他計算抵達的時間是在「十月中」，也就是說10月中旬，未定那一天。到了

²⁶ 《鴻苞》之卷3-4為《輿圖要略》。此二卷雖然收入晚期編撰的《鴻苞》中，但詳閱其內容，並參考卷後所作序論，知其編書目的，在於簡要地建立輿圖形勝的概念，應是早年所作，收入《鴻苞》時再作〈後序〉足成之。其中如卷3，頁26b，對於大運河僅載「會通河，在濟寧州，漕運河道也」一句；卷3，頁50b，〈松江府〉記松江府陸機、陸雲遺跡而無「二陸祠」、三泖湖位置，記載為：「三泖湖在府城西南三十六里」，皆無曾任青浦為令之痕跡，處處皆顯示其見解尚在紙上作業。

²⁷ 屠隆：〈與馮開之〉，《白榆集》，文卷9，頁7a：「老母弟婦，約以八月四日離家，不知何日舟過貴里，長途得無缺于資斧，日夜以為憂。」其中「約」字為「約定」之義。馮夢禎家在嘉興府，是航行中必經之地，故云舟過貴里。

²⁸ 屠隆眷屬的座船，本來約定乘坐顧養謙提供的官船，見〈與顧觀察益卿〉，《白榆集》，文卷9，頁6b。後來因為張佳胤以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左侍郎，離浙返京，乃將屠隆母妻附舟而行。但途中張佳胤又得報，已於八月二十八日升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須加速返京，遂留屠隆母妻在後。

²⁹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8b。

10月6日，他又寫〈與沈士範〉，說：

二日前，有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以九月廿又九日（1583/11/12）發彭城，計十月半後可得抵春明門矣。家兄護送老母，外父則送荊人，八口在船，俱幸無恙。³⁰

「二日前」為10月4日，「有家僮至自彭城」，即前書所言「使小力馳至前途候之」者，此人自徐州單身輕騎陸行來報信，最晚須在9月21日起身。文中「老母舟以九月廿又九日發彭城」一語，乃指「預定在」9月29日自徐州出發，則家僮必定在徐州見到屠母，探得確信。換言之，從9月20日（或稍前）到29日之間，一家人在徐州接受姜仲文夫婦的款待。事後，屠隆在〈與姜仲文〉中寫到：「嫂夫人好不？老母、荊人及小兒女俱幸無恙。」³¹便因為雙方家人曾在徐州相處，所以書信裡也問候了姜仲文的妻子，並報告了母親和妻兒的消息。

屠隆既已得知母妻定於9月29日從徐州發船，便把原推算的「十月中」改為更精準的「十月半後」，從9月29日到10月半，共計17天。但是，十幾天後，已經接近十月半了，都沒有後續消息，所以他又重新推估，在〈與郁孟野〉的信上又說：

家僮至自彭城，老母舟已離彭城十餘日矣，想十月廿後可得到都門，良為懸懸耳。³²

這次把日期再度修改，放遲到10月20日以後，調慢了5天。綜合這三次的推算看來，屠隆心目中認定的徐州到北京的標準航程需要17-18天，最多也就是22-23天而已。

事後證明延誤的原因，是座船在泊頭發生船難，見〈報張肖甫大司馬〉：

老母舟自與仙鷗相失後，受驚恐者三，最後至交河為巨木破舟，老母、荊人而下，僅以身免。某生平無長物，僅有圖書數簏，今第已問之水濱。是夕舟壞，老母而下相携野棲蘆葦中，詰朝易他舟前，今幸抵河西。³³

³⁰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10b。

³¹ 屠隆：《白榆集》，文卷11，頁3a。

³²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10b。

³³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17b。

運河上有大型運送木料的木排，文中「巨木破舟」的「巨木」指此。³⁴這次船難的地點，屠隆寫作「交河」，交河縣城並不在運河上，實為「交河縣新橋驛」，俗名「泊頭驛」。³⁵河西，就是河西務驛，³⁶距京已近，再過和合驛、張家灣，便到通州潞河驛。³⁷以朝鮮崔溥〈漂海錄〉為例，³⁸明孝宗弘治1年3月26日（1488/5/7）舟經河西務，3月28日（1488/5/9）早上就到了潞河水驛。家僮在得知屠母座船已抵河西務，回來報告時，船上的人也到了。屠隆寫了第一封〈報張肖甫司馬〉尚未發出，母親已經抵達，乃再作第二封，兩信並發。可惜這兩封信都沒有日期，張總督的回信也沒書寫日期，不能核對屠隆最後的預測是不是準確。

比較其他人從徐州到北京的大運河航行經驗：

- （1）楊士奇〈南歸紀行錄〉15天，速度最快。
- （2）楊士奇〈北京紀行錄〉20天，因為在潞河雇不到車入城延誤了一天。
- （3）吳寬〈己亥上京錄〉26天。³⁹
- （4）崔溥〈漂海錄〉25天。

在這幾件例子中，〈南歸紀行錄〉的楊士奇，是以首輔之尊返鄉祭祖之後回京，有專人為他調水開道，沿途都不滯留，速度最快，不足為奇。〈北京紀行錄〉時，楊士奇只是一般官員身分，便走了20天。吳寬〈己亥上京錄〉所用時間較多，是因為登陸去遊覽了曲阜闕里數日再回到船上，又與朋友有許多應酬，耽擱了時日。《漂海錄》的行程，曾因為運河缺水而有延阻，伴送的武官還因為害怕違誤程限而擔心萬分。由此看來，徐州至北京的客船航程，20日左右是合理的。屠隆第一次推測是17-18日，第二次推測在22-23日，等於是

³⁴ 義·利瑪竇著，何濟高、王遵仲、李申譯：《中國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26，曾記載：「神父們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載滿木材的船，由數以千計的人們非常吃力地拉著，沿岸跋涉。」這段記載的時間在萬曆20年（1592）朝鮮壬辰倭亂發生數月之後，比屠母船難晚九年。

³⁵ 泊頭驛，亦作撥頭，同音字，明代交河縣新橋驛之俗名，明·陸深：《南遷日記》，（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7冊，頁630：「十三日戊寅，晴，早發，辰刻抵新橋驛，俗名泊頭。」是也。明代泊頭驛距交河縣城50明里，今泊頭市為滄州市下的縣級市，明交河縣城則改為泊頭市交河鎮。泊頭賓館（38°3'46.08"北，116°34'42.30"東，即原泊頭縣招），離運河約800米，可為泊頭驛之參考位址。

³⁶ 今G103國道旁有河西務鎮公所（39°37'20.99"北，116°57'14.44"東）及津門首驛碑，東距大運河約1.7公里。

³⁷ 今北京市通州區政府在潞河驛故址（39°53'41.62"北，116°41'52.20"東）新做公園。

³⁸ 見朝鮮·崔溥著，葛振家注，《崔溥〈漂海錄〉評註》（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卷3，頁143-144。

³⁹ 三文分見明·楊士奇：〈北京紀行錄〉，《東里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39冊，卷48，頁10a-18a；〈南歸紀行錄〉，見同書，卷49、50全卷；明·吳寬：〈己亥上京錄〉：《匏翁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5冊，卷57，頁7a。

以20日為中心點，前後加減二、三日為誤差，與大運河航程實務是相符的。由於屠隆並沒有親自走過這段水程，他的知識應該是訪求有經驗者或是從書籍中得來。屠隆的現象提醒了我們，即使是航速並不穩定的大運河旅行，只要當事人具有高度的空間意識，關心實際數據，日程也是可以計算的。

（二）揚州至北京的陸路里數為 2500 里一語之準確性

萬曆 4 年屠隆第一次上京，曾由陸路自揚州至北京，據其〈與沈君典諸子諸子〉書云：

不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北京。⁴⁰

此書作於萬曆5年，故稱「前歲」。屠隆本次入京，是為了赴進士試，舟行至邵伯湖阻凍，乃退返揚州，改為陸行，經由六合、滁州、臨淮關、徐州入京，有〈北征記〉全述其事。重點就在「二千五百里」，究竟是夸夸其辭呢？還是確實可據的？

為了使讀者更清楚地掌握實際的空間，我以〈北征記〉為基礎，調查了相應的參考道路，加入了公路里程，作成了下表：

表二 屠隆〈北征記〉自揚州至北京里程分析表

萬曆四年	西曆月日	北征記及詩地名	推定停宿	公里數	參考道路	參考道路起訖點
12-30	1577/1/18	揚州除夕	次揚州	—	—	—
01-01	1577/1/19	邵伯湖阻凍	泊邵伯湖	—	—	—
01-02	1577/1/20	回廣陵	回揚州	—	—	—
01-03	1577/1/21	揚州春日	在揚州	0	—	自揚州出發
01-04	1577/1/22		次儀徵縣	29.4	G328	揚州掘江門—儀徵市真州鎮
01-05	1577/1/23	六合道中	次六合縣	37.4	G328	儀徵市真州鎮—南京市六合區
01-06	1577/1/24		次東葛鎮	36.3	S331	南京市六合區—浦口區東葛鎮
01-07	1577/1/25		次滁州	28.7	S311	浦口區東葛鎮—滁州市
01-08	1577/1/26	經清流關	次大柳	28.1	S311	滁州—琅琊山—清流關—大柳驛 ⁴¹
01-09	1577/1/27		次紅心鎮	44.2	S311	大柳—定遠縣池河村—鳳陽縣紅心鎮
01-10	1577/1/28		次臨淮關	30.2	S101	鳳陽縣紅心鎮—臨淮關鎮濠梁驛
01-11	1577/1/29	臨淮曉發	渡淮，次王庄	33.2	縣道	臨淮關鎮—渡淮—固鎮縣王庄鎮
01-12	1577/1/30		次大店	76.5	縣道	固鎮縣王庄鎮—固鎮縣城與大店鎮間
01-13	1577/1/31	宿州道中	次宿州	29.5	S101	固鎮縣城與大店鎮間—宿州市
01-14	1577/2/1	徐州道中	次夾溝驛	32.7	G206	宿州市—苻離集—徐州夾溝驛

⁴⁰ 屠隆：《由拳集》，卷 13，頁 18b。

⁴¹ 經本人現地踏察，知屠隆從琅琊山越嶺後，平行，至清流關前，越關，由珠龍鎮而北，至大柳驛。

01-15	1577/2/2	徐州元夕	次徐州	49.1	G206	徐州夾溝驛－桃山驛－徐州市鼓橋區
01-16	1577/2/3	彭城、戲馬臺	在徐州	—	—	復雪，暫解鞍，覽彭城故都
01-17	1577/2/4	渡黃河	次臨城驛	38.5	G104	徐州－利國驛－今棗莊市薛城區
01-18	1577/2/5	入兗州界	次界河驛	54.6	G104	棗莊市薛城區－滕縣市界河鎮
01-19	1577/2/6	鄒縣孟廟	次兗州	54.4	G104	滕縣市界河鎮－經鄒縣孟廟－兗州區
01-20	1577/2/7		次東平州	66.5	S255	兗州區－汶上縣－州城縣
01-21	1577/2/8		次東阿舊縣驛	30.8	S255	州城縣－舊縣鄉
01-22	1577/2/9	東阿、曹植墓	次東阿銅城驛	30.4	縣道	舊縣鄉－平陰縣東阿鎮－銅城驛
01-23	1577/2/10		次茌平縣	32.7	G105	東阿縣銅城驛－茌平縣
01-24	1577/2/11		次高唐縣	34.6	G105	茌平縣－高唐縣
01-25	1577/2/12		次德州太平驛	36.6	G105	高唐縣－德州市恩城鎮
01-26	1577/2/13		次德州安德驛	35.9	G105	德州市恩城縣－德州市德城區
01-27	1577/2/14		阜城縣	54.8	S281	德州市德城區－景縣－阜城縣
01-28	1577/2/15	渡滹沱河	獻縣	36.8	G106	阜城縣－獻縣
01-29	1577/2/16		河間府	30.9	G106	獻縣－河間市
01-30	1577/2/17		任丘縣	32.4	G106	河間市－任丘市
02-01	1577/2/18	樓桑村	雄縣	38.5	G106	任丘市－雄縣
02-02	1577/2/19	涿州懷古	涿州	63.1	涿白路	雄縣－新城鎮－涿州市
02-03	1577/2/20	良鄉道中	良鄉	34.1	G107	涿州市－北京房山區良鄉鎮
02-04	1577/2/21	抵北京	至都門	38.5	G107	北京房山區良鄉鎮－北京永定門
			里程總計	1313.2		

本表的結構，由四個主題項目組成：一是屠隆的旅行日程，根據〈北征記〉及沿途行程推算，再以中西曆對照，載於第一、二兩欄。二是屠隆在〈北征記〉及旅程中所作詩篇的地名，標記在「北征記及題詩地名」一欄中。三是屠隆在另次旅行中曾記錄的地名，如果不足，再用其他明人的旅行日記及洪武 27 年官刻的《寰宇通衢》及萬曆初年流行的黃汴《一統路程圖記》二書作為補充，標記在「推定停宿」一欄中。四是公里數和參考道路，利用中國現有道路來模擬路線和里數，分為三欄記載。經由這四項主題，希望結合古今的資訊，來呈現屠隆的行程。

在日程方面，由於屠隆〈北征記〉並沒有完全記載經過的日期，只留下三個站次的停留日期，即廣陵除夕、徐州元夕、及到達北京的日期；另外，就是他曾在此停留游覽。所以，我是以上述三天為標竿，再以萬曆 10 年自青浦上計之行所作的〈發青谿記〉及詩篇，以及萬曆 11 年 7 月上京赴禮部儀制司主事途中的詩篇為參證。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現代中國的省道及國道，能不能成為明代驛路參考道路的問題。基本上，中國的省道和國道多是在明清驛路的基礎上建成，已是常識，我在現地考察時，也特別注意訪察，確實如此。實際作業時，我們先將屠隆沿途所經過的地名，輸入 Google Map Pro 衛星地圖裡，然後在前一個地名與後一個地名之間，配合相關的古代方志，仔細檢查縣城（包含遷移過的古縣城）、村鎮、古蹟等條件，找出最可能的路線作為參考道路。

表中所選擇的道路，基本上符合這些需求。古今懸隔，現代道路當然不能直接等同古代驛路，研究者是在誤差最小的可能下，提供代位摹擬，在現代地圖上呈現古人的行跡，以便於今人使用而已。

至於里數的計算，古今道路的路線既然不會百分之百相同，即使相似或相近，里數也會有差距，這是當然的。不過，我在多年的擬測實務中也發覺，相鄰兩地之間，不同道路的誤差值通常不大，因此，本文所提供的里數，具有參考價值。⁴²

通過以上的說明，讀者如果能夠接受這種研究方法，那麼，便可以接受屠隆從揚州古運河邊，捨舟就陸，一直到北京城內，大約走了 1238.2 公里。這個數字，如果換算成明代的里數，會有多少呢？明代的里制，是以 5 尺為 1 步，360 步為 1 里，⁴³計里用尺的種類不詳，如為營造尺，明營造尺一尺長 32 公分，1 明里的長度，約為 576 米。將 1238.2 公里換算成明里為 2149.653 里，與屠隆所稱的「二千五百里入北京」，比例為 85.99:100，誤差只有 14%，可說十分接近。換言之，屠隆在這次的旅行中，對於空間距離，了然於胸，並不是茫茫然的奔馳在不明的大地上。

當然，我以現代公路來解說古代，讀者中一定會有人不以為然，所以，接下來仍舊回到明代文獻上，來看屠隆 2500 里之說的由來。

據《大明一統志》所載揚州到北京的里數為：

揚州府，東至海三百六十里，南至江六十五里，西至應天府六合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淮安府山陽縣界二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三十里，至北京三千一百一十五里。⁴⁴

文中「自府治……至北京」為 3115 里，遠高於屠隆所稱 2500 里，原因在於屠隆所說的是陸路，《大明一統志》所採計的是水路。《萬曆揚州府志》作「自府治……至北京，水陸俱三千一百二十五里。」⁴⁵添加了「水陸俱」三字，其實是畫蛇添足，陸路里程並非如此。乾隆刊本《大清一統志》和《嘉慶重修一統志》都作「自府治至北京二千二百七十五里。」

⁴² 測試誤差的方法很簡單，先找到四個被研究文獻中的地名，分為兩組，一組近於 50 公里，一組遠於 100 公里。在具有路線規畫能力的電子地圖，例如 Google Map，選擇路線探索，分組把地名打上去檢查，並且在交通工具上選擇步行。就會發現檢索結果已經避開了高速公路，仔細看各條路線的公里數，便知道差距不大。設想古代驛路如果也是其中一條的話，誤差值也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⁴³ 清·清高宗敕撰：〈記里鼓車·宋〉，《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卷 62，頁 1506：「古法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用較今法五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明清里法相承未改。

⁴⁴ 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卷 12，頁 1a。

⁴⁵ 明·楊洵、陸君弼：〈輿地圖說〉，《萬曆揚州府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5 冊（影印萬曆癸卯刊本），卷 1，頁 1b。其後，清·崔華、張萬壽：《康熙揚州府志》（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14 冊，卷 4，頁 1a，全錄其文。

⁴⁶這才是陸路。有趣的是，《大清一統志》的里數，不是2500里，而是2275里，和我所推算的2149.653里非常接近。

再以《寰宇通衢》和《一統路程圖記》所記載的里數來看。《寰宇通衢》以南京為中心站，《一統路程圖記》以北京為中心站；編排方式，由於黃汴是根據《寰宇通衢》而改製的，顯然較為便利。《寰宇通衢》之〈京城至北京行部并所屬各府衛〉⁴⁷，與《一統路程圖記》之〈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⁴⁸，皆詳細列舉北京到南京的陸路站名和里數，自北京會同館至滁州滁陽驛，前書為2219明里，後書為2210明里。驛數相同，里數微有誤差而已。至於滁州驛至揚州之里數，《一統路程圖記》之〈揚州府至南頓路〉⁴⁹記載為270明里，合併計算北京至揚州全部里程，恰為2480明里，與屠隆所稱「二千五百里」，僅僅相差20明里，若以《寰宇通衢》計之，總和為2489明里，僅少11里而已。

《寰宇通衢》雖然是官書性質，但洪武到萬曆，年代遼遠，不知道是不是還容易買得到？所以我懷疑屠隆所用的是黃汴《一統路程圖記》，關於該書的年代，因為書中〈淮安府由北河至陝西潼關水路〉、〈南京由漕河至北京路〉二節，都寫到嘉靖44年（1565）沛縣黃河決口，並寫到隆慶間已在徐州留城以北到南陽關之間，開鑿新渠，⁵⁰內容文字，又與徐階〈漕運新渠記〉十分相似，⁵¹可見黃汴看過徐階這篇文章。徐文作於隆慶4年（1570），此書必不會早於本年。書中黃汴自序及吳岫跋語，也自署為隆慶4年夏，因此，其成書年代應可無疑。但這本實用之書流行的時間也不會太久，因為從徐州到直河口這一段利用黃河的運道，不斷發生問題，朝廷已命新修汧河新道，萬曆33年（1605）新河完成，大運河改由皂河鎮北上，經密灣、汧口、臺兒莊、韓莊，至夏鎮，與前述隆慶新開運河銜接，而書中所載〈南京由漕河至北京路〉，仍是新河完成前的舊路，可見在萬曆33年以後並未修訂。屠隆八次旅行，都在萬曆4年至13年間，正是黃汴此書在蘇州刊刻不久，時間上非常巧合，購買也比較便利。

⁴⁶ 清·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5冊，卷66，頁1a。又，清·穆彰阿、潘錫恩等纂修：〈揚州府一〉，《嘉慶重修一統志》（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66冊，不分卷，頁1。

⁴⁷ 明·明初不著撰人：《寰宇通衢》，《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66冊，不分卷，頁61b。

⁴⁸ 本小節見明·黃汴著：《一統路程圖記八卷》，卷1，頁9a。此書又名《圖註水陸路程途八卷》，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今人楊正泰對此書研究最多，他先是出版了明·黃汴著，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書，再於所著《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以附錄形式重印，並更改書名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楊正泰在前述校注中，也錄載了清·憺漪子著《天下路程圖引》。

⁴⁹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八卷》，卷6，頁3b。

⁵⁰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八卷》，卷5，頁8a。

⁵¹ 明·陳子龍等選輯：〈徐文貞公集二·漕運新渠記〉，《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245，頁2576a。

中國古人很早就關心空間地理知識，⁵²先世的《尚書·禹貢》、《山海經》、《水經注》固不必論，唐代《元和郡縣圖志》開始記載州境、八到、本州與兩京里數，一直被後世的地理總志和方志沿用。⁵³南宋時，臨安市上已經有人販售道路里程圖，⁵⁴一直到《寰宇通衢》、《一統路程圖記》，不論官方民間，都感到輿地之廣，不可無書查照，地理空間被收納到實用的展示面上來，明代百科全書類型的《萬寶全書》，也將該二書的一部份抄寫進來，成為它百科的一種。⁵⁵但是，徒有書籍，如果屠隆本人沒有務實之心，沒有空間意識，沒有現地經驗，這些里程知識也不會落實在他身上。而且，《寰宇通衢》、《一統路程圖記》都沒有以揚州和北京為起訖點的路線，屠隆想得到揚州到北京的全程里數，還是必須自己去加總運算。這一點是考察晚明文人生活態度時，必須特別注意的。

為了更顯明空間意識對屠隆的重要性，下面再舉兩人為例，一是清代汪師韓，一是明末顧炎武。

汪師韓著有《孫文志疑十卷》，所謂孫，指唐人孫樵。他譏笑最厲害的是孫樵的名篇〈興元新路記〉，其實，該篇文章詳細記載褒斜道中各個特殊景觀的距離，以及各驛站間的里數，乃是今人研究褒斜道最重要的依據。⁵⁶可是，不具備空間概念的汪師韓，卻大為譏笑說：

只如一本出門帳簿，拙直急遽，那復有閒情逸趣耶？視柳州諸記何如？⁵⁷

對於孫樵文中數據的重要性，沒有空間現地意識的汪師韓，完全看不到。

相對於此，顧炎武《日知錄》則說：

⁵² 唐·元稹貶官江陵府士曹參軍時，白居易作〈同李十一醉憶元九〉，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437，頁4842：「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即展現了時人對於空間地理的關心，也有長途道路的計程能力。

⁵³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⁵⁴ 南宋·劉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上，頁6a，〈題白塔橋〉：「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堠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住，不說中原有幾程。」

⁵⁵ 清·毛文煥增補：〈天下水陸路程〉，《增補萬寶全書》（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年，世德堂刊本），卷1，頁19a-36a。《增補萬寶全書》是百科全書的形式，所以也抄錄了水陸路程，其中如〈北京至江南浙江福建路〉與《一統路程圖記》所載相同，連里數也一模一樣，其他省份則以省為單位，摘鈔一部份。這本書雖是清人毛文煥增補，從內容來看，如〈名臣〉，卷1，頁57a，僅到明孝宗朝，歷科狀元僅收到明天啟朝，可確定是明代舊書，略事增補而已。

⁵⁶ 詳見拙作：〈唐孫樵〈興元新路記〉江口鎮以北路段之現地研究〉，《國文學報》第50期（2011年12月），頁209-244。

⁵⁷ 清·汪師韓：《孫文志疑十卷》（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12年叢睦汪氏遺書本），卷4，頁3a-6a。

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⁵⁸

蘇州到山東鄒縣（今鄒城市）的走法，一般是先走水路，沿大運河北上，顧炎武是明末人，大運河已走泇河新道，應在夏鎮登陸，乃至鄒縣。我們仍依前文的方法運算，從蘇州到鄒縣孟子廟為792.7公里，以明里換算為1376.2里，與顧炎武所說的1500里，比數為91.7:100，誤差值為8.3%。對顧炎武來說，《寰宇通衢》和《天下水陸路程》所記載的南京到山東布政司的道路，都是萬曆33年以前的舊運河故道，已經不可為憑據了，這一千五百之數，必須自己運算。當然，以顧炎武對空間輿地的專長，這一點並難不倒他。

在一般人的形象分類中，顧炎武是著有《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實學家，屠隆只是文人，而且是晚明文人。但是，我們從他計算母親的航行日期，以及精確地說出北京到揚州的里數這兩個事例來看，屠隆對於輿地空間的掌握，和顧炎武一樣，都是很務實而且重視數據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便不能了解屠隆。⁵⁹

四、屠隆「放縱」的真義

回顧前兩節所見，屠隆對於入京的道路，不論大運河水路或是平行陸路，都有準確的認識，也有實際走過的現地經驗，他不但熟知里數，也能計算在途所需的日數。既然如此，當他分明知道牒期已近，理應從7月1日出發時，就妥善安排合理的行程，不會在出發後多天，尚毫無警覺的耽溺於流連酬酢，到不得已的時候，才緊迫地策馬急行。16.5個在途日內從吳大帝陵口飛馳到北京，等於是測試了人體的極限。難道不是屠隆預先已經想到，要在這條道路上故意作一異舉，造一驚奇嗎？

我認為，屠隆這一次的驚奇之舉，既有對空間道路的把握，也根源於性格中的「放縱」。

⁵⁸ 清·顧炎武：〈里〉，《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卷32，頁930：「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

⁵⁹ 以天下之大，有明一代關心空間地理而熟悉大運河水陸之程者，當然不止屠隆。如明·趙維寰：〈征塗〉，《雪廬焚餘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88冊，卷10，頁56b-58a所云：「余以計偕之役，老於道塗，水陸之程，多所親歷。」這種因為多次往來北京會試而老於道路的人，自然還有。至於稍後於屠隆的王士性（1547-1598）、謝肇淛（1567-1624）、徐霞客（1587-1641）等人，也不提及，是因為王、徐二人未紀錄大運河；謝肇淛雖因任職工部都水司郎中，駐在張秋之故，曾作《北河志》，他又於萬曆16年北上赴試時，作有〈燕行記〉，《小草齋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75冊，卷7，頁1，文中既載日期，亦錄經過地點，且自徐州以後又改行陸路，本來可舉出為參考。但該文錯誤不少，本篇既以屠隆為主，無暇校正，故亦省略，惟讀者善識之。

下文中將由屠隆對色慾與妻子的書寫、以及好徹夜之遊這兩點，探討屠隆的「放縱」真義。

「放縱」雖然是任性而為，但不等同於「放情於酒色佚樂」，至少屠隆的體質是不能飲酒的。有三個證據可證明他不善飲酒，一是〈發青谿記〉所云：

頃之，瑯琊公來，邀遊弇園，而吳門袁太常洪愈適至，太常清謹，號吳中名德，而頗豪于酒。余雅不善杯酌，調微不同，而一見驩然入也。⁶⁰

這是萬曆10年11月14日（1582/12/8）之事。當時袁洪愈（1516-1589）從南京太常寺卿引疾在家，他是王世貞的長輩，故來弇園。屠隆正要入京上計，向王世貞辭行，兩人不期而遇。文中屠隆說自己不善於酒，由於別無隱寓、別無寄託的必要，此言可信為真實。

二是在〈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不肖不善酒，亦不能狂，在門下，所素知者。當諸客淋漓時，隆面壁，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⁶¹

宴飲之堂是須脫鞋子的，他說自己在眾人飲酒時，獨自面壁趺坐，合於客觀情境。王世貞（元美）和王錫爵（元馭）是屠隆所親敬的前輩，這封信是屠隆於萬曆12年10月罷官之初，為爭取二王先生的支持而作，文中既說「在門下，所素知者」，顯然是要以二王先生所素知的經驗，來爭取他們的認同，應該可信。而且，屠隆喜好打坐，前引〈發青谿記〉中，便曾寫到「在婁東日，入恬憺觀，「跏趺大師蓮座下，至三鼓起，步月中庭」，其他篇章也有不少這類的記載。

三是張佳胤在〈屠長卿儀部以才落職，別余檀州，遂作關塞之遊，示以長歌，余亦和歌別之〉一詩的自注中寫道：

長卿不飲而喜嗜羊羔酒。⁶²

前四字「長卿不飲」，肯定的說屠隆不飲酒，後半句說他只對羊羔酒有興趣，羊羔酒是藥酒，在穀物中加入羊肉和少量杏仁、木香同釀，並非一般酒，《本草綱目》有之。⁶³

⁶⁰ 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文卷5，頁11a。

⁶¹ 屠隆：《白榆集》，文卷11，頁13b。

⁶² 明·張佳胤：《居來先生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1冊，卷4，頁25b。

⁶³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卷25，頁1566。

從這三條自述可知，屠隆不飲酒和體質不宜有關，和心理性格無關。不能飲，所以不發酒狂，但他好招客聚飲，喜演劇、蓄聲妓、作艷歌，這些都是事實，他自己也多次在文章和書信裡說了。⁶⁴雖然如此，如果認為客飲、演劇、聲妓、艷歌就是屠隆的放縱，就沒有看到的屠隆放縱的本質。

（一）色慾書寫和妻子書寫對禮法的放縱

屠隆的放縱，首先是對色慾的「放縱」，但不是在色慾行為本身，而是在敢於開放地書寫這件事。

屠隆不避諱地和朋友談論自己的色慾，友人李頤為蘇松兵備副使時，⁶⁵屠隆作〈與李觀察〉寄給他，談到自己男女之慾，難以去除：

三年治慾，若頓重兵堅城之下，雲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若以巨石壓草，石去草生；若以冷泉沃渴吻，暫時清涼，過而復熱，獨可奈何哉？嘗借上清之劍斬之，逾年而不動，業自謂已斷，其後忽不覺復動，乃知其根固在也。⁶⁶

繼之，他用自己常說的三教合一論法，拿古天竺先生（佛）、高真上仙（道）、帝王聖賢（儒）解決色慾的方法來辯說：

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則其根也。根，故難去也。古天竺先生號稱離慾，蓋以空得之，雖上帝所治，猶為慾界。高真上仙，偶動一念，輒往人間。而古帝王廣設后妃、御妻、世婦，儒者曰：「以廣繼嗣，非為慾也。」亦或以不能遣之，而以此正人道防淫也。漢高祖、光武、昭烈、唐文皇，咸振世英雄，識量不凡，而閨闈婉孌之情，幾與常人等，項羽、石虎之流，雄猛虓暴，殆非復人情，至兒女子周旋，雄猛之氣，一時都盡。蘇子卿、胡邦衡、文丞相諸公，非世所謂秋霜皦日之士哉？而亦不免留情于此。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辭亦痛切足悲哉。根之所在，難去若此，即聖人不能離慾，亦澹之而已。離則佛，澹則聖，抑而寡之則賢，縱而宣

⁶⁴ 屠隆知名度高，四方客常滿座，應非虛言。參見屠隆：〈上壽母夫人九十敘〉，《栖真館集》，卷11，頁25a，云：「比某入為蘭省郎，郎俸薄，貧甚，腰下僅一銀帶，銷以佐朝夕，而某遊道日廣，四方客常滿座，太夫人與婦拮据為供帳，意良渠。」文中所言賣銀帶宴客之事，屠隆的朋友間多知其事。

⁶⁵ 此以李觀察為李頤。李頤，字惟貞，餘千人，隆慶二年進士。屠隆：〈李觀察〉，《鴻苞》卷42，頁33a，曾載二人談鬼神事。同時有李承式，亦曾任浙江按察使，似非其人。

⁶⁶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20a。

之則凡。（《白榆集》，文卷9，頁20a。）

寫信，是朋友間就互相知道的事情在談論，因而只有議論說理，沒有舉出具體的事，如果參看《鴻苞》就很明白了，在〈調心有三難〉中，屠隆直言自己曾好男色，至今見姣童而悅之，其文云：

廣桑子初學道于曇師，驟而勇猛，慾念不起者逾年，遂自謂離慾矣。偶見一姣童而心悅之，然後乃覺此根尚在，向之不生，石壓之也。根苟在也，即終身不見，終身不動，猶為頑空，猶屬斷見，難矣哉。⁶⁷

此文作於萬曆12年，但所談的是萬曆8年的事情，而且，文中用語多曾見於〈與李觀察〉，可見所談的是同一事。屠隆說到自己「偶見一姣童而心悅之」，這時他正任職青浦知縣，已經學道於曇陽子，修心逾年之後，還是會動心，可見他早年之深好男色。

同在萬曆8年，他聽說沈懋學買了少妾，馮夢禎也買了姣童，遂寫了三封短箋給沈、馮二人：

吳姬買不？挾之艫中泛五湖，此便是范少伯本色，第太蚤爾。新人即能勝故，幸勿使孫夫人抱長門之恨，恐他日更煩長卿。（與君典、開之）

沈郎買一麗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風月，大鬧吳門。兩太史亡賴，東南霪雨，疑二足下所為。（與馮開之）

僕近者玄虛日進，世情轉空，誓降三尸，終期五岳，甚不欲抱淫慾之心，積幽冥之過，以自墮棄。（與馮開之）⁶⁸

這三封信雖然都是好友之間的戲謔，但他一則提醒沈懋學不要讓舊人（指孫氏）抱恨。二則說兩人色慾太過，引發蘇松地區大水。蘇松的霪雨，本來並不相干，卻把它拉來當作嘲笑的話頭。三則說自己甚不欲抱淫慾之心。這些內容，除了誇耀自己學道之後的不同調，其背後也存在著對色慾的思索。不過，若從觀察明代文人思潮變遷的角度來看的話，更應該要注意的，毋寧是屠隆能夠很輕鬆地把色慾放在口邊來說，這個行為的本身。

從嘉靖以後的文集，才漸漸敢於談說自己的妻妾，但即使是李開先，他敢寫下「且補

⁶⁷ 屠隆：《鴻苞》，卷35，頁44a。

⁶⁸ 三文分見屠隆：《由拳集》，卷17，頁21b、25b、17a。

敝貂偎拙妻」的香豔詩句，《閒居集》裡也不敢寫到「色慾」二字。⁶⁹屠隆不但公開談自己和友人的色慾，也敢於公開的向人談妻子的細事，這又是一個放縱的行為。

屠氏是甬上名族，不過，主系卻不是屠隆這一支派，他父親作生意也失敗，很早就退出商場。因此，屠隆一直認為自己很窮，不斷的向人訴貧，經常借錢、還錢、又借，甚至說自己初到北京任職時，雖然是部郎，但房子租不起，好馬也租不起。⁷⁰可是，就在同一個時間，他卻和王辰玉（1561-1609）說了這樣的事，見於〈與王辰玉〉一書中：

年來絕懶不讀書，萬事盡捐，一絲不挂。細君賢，有治家才，往歲僕北上計，以俸餘急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湯走其下，僕歸而一朝有之。⁷¹

王辰玉名衡，閣老王錫爵（1534-1661）之子，屠隆所師事的曇陽大師（1558-1580），⁷²便是辰玉的親姐，二人曾談論道佛，所以有引文開頭那三句。接著，他說到自己妻子有治家之才，當自己入京上計時，妻子在四明故里買了小樓三間。王辰玉是大富大貴之後，年紀又輕，屠隆妻子買的這種小樓，根本不在他眼中，因此，屠隆這段話的重心，並不是談論置產，而是誇耀妻子賢能。與此相似的，是在《鴻苞》一書中，他也多次贊美妻子比自己聰明、好施。⁷³

以明代士大夫的禮法標準而言，公開寫色慾，大方的談妻子，同樣是很大的突破和放縱。當時上層社會的主流思想仍然是修身慎行，自我約束。特別像前舉的王錫爵，因為女兒出家，並且於出家不久死去，被喧傳為羽化的緣故，他既愛女兒，又要避免朝野的攻擊，就更為謹慎。《王文肅公文集》把所有文章分為《奏疏草》、《公牘草》、《文草》三類，其

⁶⁹ 「且補敝貂偎拙妻」句，見李開先：〈寒雪行〉，《閒居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2、93冊，卷1，七古，頁17a。李開先曾買妓女張二為妾，張二死，作誄極哀豔，又作〈攜妓送別圖〉詩。又有〈無題〉云：「不見嬌娥年復年，却將好色易賢賢。病沉沈約風流客，夢斷襄王雲雨仙。喜報燈花空我負，詩題紅葉倩誰傳？終期柳氏歸韓翃，只恐楊枝別樂天。」詩中的主角，恐怕也是欲納為寵妾而不成者，但即使如此，他仍不敢自談色慾。按：〈侍姬張二誄〉等三篇，分見《閒居集》卷1，詩雜，頁3a；卷3，七律，頁33b；卷3，七律，頁79b。

⁷⁰ 屠隆：〈與劉觀察先生〉，《白榆集》，文卷9，頁7a：「某此行良苦，可為知己道，未可與世人言也。此身之外，都無長物，至力不能僦一居室，而栖市口窮湫隘處，諸君來過者，咸問何故居此？騎一款段黃馬，曰何故騎此？某不能對也。」這應是初到時事，其後母妻至京，還是租了像樣的房子。

⁷¹ 屠隆：《白榆集》，文卷13，頁13a。王辰玉，28歲（萬曆16年，1588）舉順天鄉試第一，41歲（萬曆29年，1601）會試成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屠隆致書時，辰玉年24，尚未應鄉試。

⁷² 屠隆為青浦縣令之日，拜曇陽子為師，載於其致孫以德書，見屠隆：〈與以德〉，《白榆集》，文卷6，頁20b：「曇陽師真遂證大道，位列上清，以（萬曆八年，1580）九月九日羽化，寶籙玄言，丹書僊篆，僅有存者，君典幸授玄教為弟子，不佞弟亦濫蒙甄收。」

⁷³ 如屠隆：〈調心〉，《鴻苞》，卷35，頁43a；屠隆：〈一切惟心〉，卷28，頁20a；屠隆：〈學道患有住〉，卷37，頁26a等篇皆是。

中《奏疏草》是朝廷相關文字，自然嚴謹，《文草》中除了墓文之外，各體文的數量不多，也不必說，《公牘草》共有 16 卷 1456 封，卷帙浩繁，他不但標題冠以「公牘」，內容也力求謹慎免禍。茲以其中一封〈屠赤水禮部〉為例：

近有綿竹一僧來報化靈顯現顛末，相見一齋，不敢輕和半語，蓋處僕之地，其理其勢當然。足下既審世多疑謗，幸且膠口戰身，靜以君躁。⁷⁴

屠赤水，便是屠隆。這封信寫於萬曆28年（1600），王錫爵67歲，已從輔相歸老多年。文中寫到的「化靈顯現顛末」，乃是曇陽子之事，因為涉及宗教與靈顯，近於異端，所以不敢輕和半語，可謂謹慎之至。而且，屠隆從萬曆12年10月削籍斥歸已經過去十六年了，標題上仍寫著「屠赤水禮部」，用其官銜，顯示他不肯一毫失禮於人。這些行為表現，便是明代士大夫的標準禮法。

回顧屠隆剛被罷斥時，與王錫爵相遇於射陽湖，其時王錫爵正北上赴召，即將入閣，便以「息閑逍遙、絕跡慎行」來勸告屠隆，見屠隆〈答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一文：

射陽湖上遇元馭先生，拳拳以逍遙為禍本，莊老乃長卿之賊，欲不佞閑關息游，絕跡五嶽，一切划去，歸乎簡寂，其言甚切。⁷⁵

雖然從以後屠隆的作為看來，這番勸說顯然無效，但王錫爵的謹慎，也更加襯托出屠隆的放縱。

屠隆罷官，間接地說，也和女色、色慾有關。這件事出於刑部主事俞顯卿的參劾，俞禮卿指控屠隆的過失便是「淫縱」，至於「淫縱」的內容，只是說年輕的西寧侯宋世恩，在北京官邸裡宴會演劇時，讓未滿二十歲的妻子和屠隆見面而已。⁷⁶屠隆辯稱西寧侯雖有「將攜妻子通家往來」之語，並未實行，更否認自己曾見過宋妻，認無不合禮法的情事。最後朝廷以模糊的方式來了結這件參劾案，俞顯卿也因為以刑部主事身分參劾禮部主事，

⁷⁴ 明·王錫爵：〈公牘草〉，《王文肅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集部第135、136冊，卷16，頁34a。

⁷⁵ 屠隆：〈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白榆集》，文卷12，頁4b。

⁷⁶ 萬曆12年夏，董嗣成以疾告歸後，屠隆始與西寧侯結識，但兩人交情發展很快，可參屠隆：〈報董伯念〉，《白榆集》，文卷11，頁8b：「宋西寧小侯至自秣陵，攜詩人黃白仲北，此兩生殆將奪伯念座，其人才亦大可念。」此期間，屠隆歡宴、演劇甚張狂，同前書又云：「弟自別足下，風塵紛溷，日甚一日，時時脫細君繡襦簪珥，向燕姬壚頭貰酒佐客歡，客跳地仰天，大呼浮白，不知鮑宣家桓夫人耀首之具盡矣，蘭省客亦大豪舉哉。」這些情節，正是在俞顯卿舉劾他的前夕發生的。

乃非其本職的出位瀆奏，而被雙雙處以落籍罷斥。屠隆被罷官後，到處寫信向人解釋，⁷⁷但王世貞卻相信應有其事，因而屠隆向人抱怨說，我雖然字「長卿」，王世貞不應該把我和漢朝「司馬長卿」一樣看了，這是說司馬相如引誘卓文君，我並沒有做這種事。⁷⁸熟悉《弇州山人四部稿》的人便知道，王世貞既是禮法之士，作如是反應，並非無故而然。

（二）徹夜不眠的身體放縱

徹夜不眠並沒有什麼不好，李白、杜甫便常如此，現代人整夜讀書工作的更多，放縱，不是好或壞的問題，而是生活態度問題。其他人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時候，選擇徹夜不眠，乃是對自己身體的放縱，觀察屠隆，不能忽略這一點。

在〈與李觀察〉書中，他自稱：

所最好者，二三知己聚于一室，清夜張燈，焚香啜茗，高譚性命，剖析玄微，參三氏之異同，窮九流之要義，間以世法，旁及神怪，掉而之六合之外，收而返六合之內。……聽之使人魂拍拍而飛動，神恂恂而遊于四荒。然多言數窮，損精耗氣，退而未嘗不悔，悔而迄不能改，譬之貪夫殉財，淫人好色，內省生平獨有此一嗜，亦幾成癖矣。⁷⁹

這段引文指出兩點，一是「二三知己聚于一室，清夜張燈」，一是「焚香啜茗，高譚性命」，屠隆對儒釋道三教合一特別有興趣，所以高譚性命這一部份很確定，不須贅言。值得注意的是，「二三知己聚于一室，清夜張燈」，其實就是熬夜談話。因為熬夜，感覺身體變衰弱，因而有「然多言數窮，損精耗氣，退而未嘗不悔」之語。

在青浦任知縣時，他曾因為夜遊，被毀謗者指為曠廢職務，據〈泖上澄照寺作〉的小序云：「泖上澄照寺逢鏡上人，談禪至夜半，忽聞門外蕩槳聲，問之，則故人施可嘉、莫廷韓、徐長孺、楊爾傳見尋，為之清言達曙矣，作此留山中。」⁸⁰詩中並有「作吏余懷出世心」之句。又有一次，沈明臣（嘉則）、馮夢禎（開之）來訪，諸人也夜泛出城，並

⁷⁷ 屠隆向多人申訴，屠隆：〈與張大司馬肖甫〉，《白榆集》，文卷 11，頁 9b；屠隆：〈答鄒孚如吏部〉，《白榆集》，文卷 13，頁 4a，可為代表。張肖甫已見前文。鄒孚如名觀光，萬曆 8 年進士，此時為吏部主事，與同年董嗣成（伯念）、姜士昌（仲文）等，皆與屠隆交好。

⁷⁸ 屠隆：〈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白榆集》文卷 11，頁 13。

⁷⁹ 屠隆：《白榆集》，文卷 9，頁 20a。

⁸⁰ 見屠隆：《白榆集》，文卷 2，頁 6a。泖上即泖湖之上，泖湖為青浦縣西南郊外的名勝，屠隆曾游之長水院泖塔，見屠隆：〈長水院塔記〉，《白榆集》，文卷 5，頁 7b，現有修復之古蹟。塔所在，今歸上海太陽島渡假村，2015 年 6 月間余往考察時，逢特大豪雨，渡假村大門管制不得入，僅在泖河西岸張馬奎閘（31°1'58.53"北，121°5'1.04"東）隔河拍攝泖塔。距明代縣衙水路約 16.6 公里。

登上城牆，當時所作詩篇如〈浦口夜泛同沈嘉則、馮開之三首〉，有句云：

出郭逍遙亦偶然，夜深明月滿樓船。⁸¹

又有〈秋夜與嘉則先生微服登城四首（錄一、二、四首）〉云：

月照嚴城露滿天，六街燈燭散秋煙。青溪窈窕無人處，忽送清歌出水邊。水抱千家樹色空，逍遙野服步涼風。自憐得傍真人氣，疑在緱山明月中。郭西寒渚落紅衣，隱隱疏林白板扉。紫苕參差菱葉暗，唱歌浦口夜船歸。⁸²

觀各詩的內容，他們確實是徹夜未眠。這次酬和的詩篇，編集為《青溪集》，屠隆自撰〈青溪集敘〉稱：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鄙，為澤國，空波四周，多鷗鳧菱芡，景小楚楚。每乘月蕩槳，如鏡中遊，九峰三泖落几席。湖上蓋又有二陸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先生、就李馮開之吉士適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方舟出郭，行遊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水天並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宵漢，因風而送曼聲，樂甚。已後，相攜泛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丘，躡天馬，吊二陸祠，慷慨興懷。……于是謀刻先生詩，余與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⁸³

此文堪注意者是「已後」二字，已時相當於現代上午九點，屠隆等三人先乘月泛舟，地點在縣城旁。這一夜，三人大概是徹夜不眠，到天亮才小寐，已時早食。餐後繼續遊玩遠處泖湖中的寺院，距官門約16、17公里，繼又登上余丘（佘山）和天馬山，這兩座山相鄰，皆在縣衙南，距官門各約8、9公里，山都不高，但把這些地點全部遊覽完，所需時間大概要一整天。

〈發青谿記〉則記載友人們在無錫縣為他送別的那一夜，先是「夜泊城下，諸名士送者咸有篇什，仍索余詩留別。時送者八人，人各二章，是夜共賦七言絕句十六章，作書復倍之，憊矣。淫精耗氣，可不戒哉。」這時，人已經很累了，但因為王穉登（百穀，1535-1612）新到，眾人又相呼登惠山：

⁸¹ 屠隆：《白榆集》，詩卷 11，頁 24b。

⁸² 屠隆：《白榆集》，詩卷 11，頁 25a。

⁸³ 屠隆：《由拳集》，卷 12，頁 30b。

相攜踏月入慧山，呼童子汲第二泉烹茗，人啜一甌飲。甘露天漿，不啻也。山氣作，清寒，衣裘頓失。煙月溟濛，不甚明了，而奇峰古木，合沓蔽虧，如罍罍障子，隔紗籠，掩映可愛。余與諸子各分大石而坐，徘徊良久，比下山，群雞咿喔矣。⁸⁴

此夕之遊，到天明才罷。此外，前引萬曆11年7月北征時，〈與陳廣野給諫〉記同遊虎丘，也是到天亮才回：

猶憶與君科頭坐磐陀石上，萬木交陰，涼颼滿天，素月西流，河漢左界，為歡惜別，魄動神飛。明日陵口望故人，盈盈一水矣。大江湯湯，不澆長恨之端，亂流而渡，低焉黯淡。⁸⁵

這篇短文，風神極美，但我們所談的不是文情之美，從事件本體來看，虎丘不在大運河航道旁，二人必須離開河船，另登虎丘，時序已在7月16日，素月西流，天已曙矣。

總而言之，當我們看到屠隆公開談色慾，談自己控制不住對男色動心時，應注意的是，不是色慾本身，而在於他敢公開自己的行為和想法。當我們看到他毫不隱蔽地公開妻子的言語、形相、居所、能力，也是放縱自己去超越禮法中對展露女體的設限。他喜歡夜談與夜游，雖然並不是過失，但一而再地追逐夜間活動的樂趣，其實也就是對自己身體的放縱。萬曆11年7月這次馳馬事件，創造了一次足以自誇的經驗，本質上，同樣是對自我身體的「放縱」。

五、乘船、肩輿、騎馬選擇背後的俠客情懷

明代長江以南的文人，往來江南和北京，主要走大運河，尤其是長江以南的文人。比較著名的，如文徵明於嘉靖1年（1522）2月以歲貢隨計入都，即由大運河舟行，三年後南歸，仍由河上。其次是歸有光，據其〈己未會試雜記〉、〈壬戌紀行上〉所述，兩次都由

⁸⁴ 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文卷5，頁11a。

⁸⁵ 屠隆：《白榆集》，文卷12，頁12a。

大運河，⁸⁶壬戌是嘉靖 41 年，這一次北上，他於 12 月 24 日（1563/1/18）發臨川，沿流而下，抵達鎮江府之日，正逢除夕（1562/2/3），次日元旦渡江至揚州，最後在 2 月初 4 日（1562/3/8）抵達北京。歸有光這次北行，與屠隆的第一次北征，年份雖然不同，到揚州之日只有相差一天（屠隆是除夕夜到揚州），入京的期限相同，氣候也高度相似，就反映了一個問題：既然歸有光可以在大運河上，以同樣的期間完成他的旅程，可見屠隆雖然在邵伯阻凍，未必一定要陸行。但是，屠隆選擇了陸行，讓他得到了第一次長途騎行的經驗，留下相當令他感動的經驗。

再看袁中道，《游居柿錄》記載他於萬曆 37 年（1609）入京赴試的經過：

九月二十日由漕入都，日暮抵邵泊，蘆花生洲渚間如雪。按此地，予凡三度往來矣。乙未之歲，中郎令吳，予由都門從水道往依之；戊戌，中郎改官入補順天校官，時眷屬寓真州，予送眷屬入京，即入國學肄業。辛丑，伯脩卒于都，送柩出，凡三度。白水青山，情緒萬端，今睹此路，感念舊事，意皇皇也。⁸⁷

袁中道是湖北公安人，他回憶已經三度走這條水路，今年仍由大運河上京，他在公安登舟東下，⁸⁸再於鎮江換運河船北渡揚州。不過，當9月26日（1609/10/23）他的船到宿遷時，阻風數日，⁸⁹不得不考慮陸行，當時他說：

阻風宿遷，……風捲河流，雪浪千丈。十月初一日（1609/10/28）己酉，住宿遷。風猶勁，始知黃河竹箭之流，復當西北風生發時，萬萬乎不可舍陸從舟。一僕又病不支，青女漸至，前途寒苦，若何為計乎？⁹⁰

明代大運河從淮安府渡淮後，自清河縣清口經桃源、宿遷、下邳、到徐州，皆用黃河河道，文中兩度用「河流」、「黃河」，皆指黃河（今名廢黃河），河道行進的方向是西北向，所以文中有「復當西北風生發時，萬萬乎不可捨陸從舟」。這一年是萬曆37年，大運河的泇河新道雖然已在萬曆33年完工，但據袁中道所云：「行此河已三、四年，但河口多淤塞，中

⁸⁶ 二文分見明·歸有光著，周本淳點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別集，卷6，頁847、851。

⁸⁷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遊居柿錄》，《珂雪齋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頁1172。

⁸⁸ 明·袁中道著，〈東遊記〉，《珂雪齋集》中冊，卷13，頁562：「遂以三月之十八日己亥從公安發舟」。

⁸⁹ 9月26日的日期，乃根據前文所載「二十日，暮抵邵伯」而推定。

⁹⁰ 見《遊居柿錄》，《珂雪齋集》下冊，卷3，頁1173。

多淺。」⁹¹則以他的判斷，迦河新道並沒有真正順航。

在這篇簡短的文字中，袁中道寫出了自己的憂心，從9月26日到10月1日考慮登陸之前，他仍然猶豫不決，再過兩夜，到10月初3日（1609/10/30）早晨，才決意束裝，陸走下邳、趨徐州。從文中的猶豫看來，車馬並非他所樂意的。

竟陵人鍾惺初次隨計時，從湖北走陸路入都，⁹²以後往來京邑，他都乘大運河船。萬曆44年8月25日（1616/10/5），他由潞河南歸，下船時所作的〈入舟〉詩，便說到「所畏更車馬」：

勞勞人我際，歸路即休期。所畏更車馬，風雨以驅馳。川途聞屈曲，行止安能知？周身天與水，物役不我隨。⁹³

像種畏於車馬，樂於行舟的詩文，其實不少。大部份人都喜歡利用大運河船往來北京，只有屠隆獨特的選擇，令人印象深刻。

為何屠隆一再選擇陸行？為何陸行中不樂乘轎而樂於騎馬？促成這樣的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的俠客之心。下文中，將從不忍人之心的俠氣，及馬上顧盼的俠客風神這兩方面，來解讀屠隆。

（一）屠隆俠氣——不忍人之心

進入本子題之前，先介紹一件極有人情味的生活小事，這是萬曆11年，屠隆一家人在北京租屋時，為房子貼了壁紙和重新粉刷，裝修得很美。朋友都很奇怪，認為這不過是租來的房子，暫時住一下，花這麼多錢，不是白白為房東作工嗎？他說：

冥寥子僦寓一宅，糊楮加垆，飾之甚精。或曰：「僦寓者，傳舍也。傳舍何以飾也？無乃為人飾乎？」冥寥子曰：「亦飾亦寓也，何人之有。」⁹⁴

⁹¹ 見《遊居柿錄》，《珂雪齋集》下冊，卷3，頁1173。袁中道捨舟登陸之後，經新河口，而發是語。

⁹² 明·鍾惺撰，李先耕標校：《至真定》，《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10，頁160：「偶隨計吏北之官，一月嚴程七日殘。文物清時王事易，風霜遠道客身難。每來幽薊多逢臘，此度滹沱獨不寒。朔氣最高冬未雪，豈宜春近土猶干。」一月嚴程，即程限為三十日。此萬曆40年12月22日（1613.02.11）事也。

⁹³ 明·鍾惺撰，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3，頁28。

⁹⁴ 屠隆：〈人我〉，《鴻苞》，卷44，頁46a。

從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到屠隆對事情的看法，落想點與常人大不相同。類似於此，則是他拒絕肩輿，說是怕肩夫勞苦而不忍乘輜，其落想也在一般士大夫的觀念之外。

明代士大夫的觀念中，低階人員騎馬，高級官員乘輜，在社交的場合中必須乘輜才顯出身分，這些都曾記載在利瑪竇的《中國遊記》。⁹⁵屠隆於萬曆4年及萬曆10年兩度北上時，都有乘輜的記載，可是他卻明白說出自己不樂乘輜：

疾風吹大野，萬木相號鳴。青天一何高，寒原曠以平。河水凍不流，草枯層冰生。煙昏白日慘，墓田紛縱衡。肩輿行蕭蕭，虺隤馬毛輕。僕夫手足皸，言語無懽聲。以茲涉歷苦，感歎百憂并。（冬日道中）⁹⁶

遠道多辛苦，風霜老客顏。病猶能跨馬，愁不廢看山。（宿州道中）⁹⁷

廿六日，達南滁，大雪，渡清流關，其行甚困，而所見山川風景亦甚奇。境內有瑯琊山、庶子泉，俱從輿中過，不及一問其處。（〈發青谿記〉）⁹⁸

鞍馬累日，面目皴皺，鬢髮為枯，而懷抱殊不作惡，亦竟忘其罷，馬上口占詩，日可數十首，藁之腹中，歇馬酒肆，輒索筆書之。……途中雖備一輿，而愍輿人不任勞苦，多下而乘騎。（〈發青谿記〉）⁹⁹

上述一詩二文，寫作年份不同，前兩篇是萬曆4年北征所作，從「肩輿行蕭蕭，虺隤馬毛輕」看來，他正騎著馬，空輜隨行。¹⁰⁰到了北直隸以後，詩篇就只見馬與車，沒有空輜了。¹⁰¹後兩篇出於〈發青谿記〉，記萬曆10年上計之事。據屠隆說，11月26日這一天，經過滁州道中，他本來坐在輜子裡，已經走過瑯琊山一大段，瑯琊山的名跡都沒有看到，所以，未到清流關他就下輜，改為騎馬了。第三段文字，是從東阿縣到東昌府（聊城）的途中，他「愍輿人不任勞苦」，所以多下輜乘馬。對照他在穎上和青浦作令時的事蹟，屠隆對輿

⁹⁵ 義·利瑪竇：《中國遊記》，頁58、294。

⁹⁶ 屠隆：《由拳集》，卷4，頁7b。

⁹⁷ 屠隆：《由拳集》，卷8，頁21b。病猶騎馬，亦見其不勞輿人之意。

⁹⁸ 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文卷5，頁11a。又，庶子泉，見明·趙明廷：〈題庶子泉〉，《南滁會景編》，《四庫全書存目叢刊》集部第300冊，卷8，頁3a。

⁹⁹ 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文卷5，頁11a。

¹⁰⁰ 本句典出〈詩經·周南·卷耳〉，《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91年），頁2：「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原來的典故是指我在騎馬中，由用典原則來說，指屠隆此時是騎馬而非乘輜。

¹⁰¹ 如〈北地二首〉之「日光沉馬足，風色隱車輪。」；〈涿州懷古〉之「馬踏新丘壠」，〈渡滹沱河〉之「目送歸人急，心懸征馬過。」；〈良鄉道中〉之「車馬去班班，多行莽蕩間。」及次年歸途所作〈任丘道中〉之「信宿來時路，銷魂是去年。人家耕廢壠，馬足踏平田。」各詩所載，時而馬，時而車，已無肩輿。分見屠隆：《由拳集》，卷8，頁24a、24b、25a、25a、26a。

人的不忍之心，並非虛談自炫。

在青浦知縣時，曾發生〈御史軻〉事件，屠隆不忍部下人民因為高官的欲求而遭受苦辛，乃挺身而出：

治河御史某公，乘維揚巨舸抵青浦，冬月水淺冰合，舟澀不行。御史傳令夜浚河，率下水輒凍僵。五鼓，聚眾千人挽之，從旦至暮，舟屹不稍動。溟滓子曰：「……官與民力竭憊矣，請易官艦差小者以行，而留巨艦以待春水。」固請之，御史持不可。溟滓子呼曰：「河神效力」，乃拜，頭未至地，而舟忽自行丈許。百姓大噪，曰：「舟行矣。」復入禱于城隍曰：「使者巨舸澀不行，民力且憊，卒下水輒凍僵，奈何？願乞靈明神與河伯，假水數尺，導使者舟，凍者幸活之。」禱甫畢而出，抵城門下，河卒奔告河水忽暴漲數尺，千人散去，舟人以篙刺舟行矣。（鴻苞·御史軻）¹⁰²

事件本身注入太多神蹟，給人過度誇張之嫌。¹⁰³但是，這件記載的背後，卻是身為儒者的屠隆，展現了他的俠義心，相當值得重視。在故事中，高官是施虐者，屠隆是為民請命的小官，當小卒下水凍僵，小民千人齊力而不能移船時，他喊出：「我來。」然後在城河邊下拜叩頭，現場必定滿是泥濘碎冰，知縣身著官服跪拜於地，畫面相當感人。接著，他又到縣衙不遠處的城隍廟拜禱，拜禱完，才剛回到城下，河水就暴漲數尺，巨舸得以移舟，避免了一場小民的浩劫。

相似的事件，也發生在穎上縣，見〈鴻苞·凍卒〉篇：

有監司過穎，時天寒大雪，數卒饑凍將絕。溟滓子聞之，馳騎送絮衣，燎火活之。監司以卒路旁奔走不力，明日，下檄盡解諸役。溟滓子俱放免焉，而獨往待罪，監司特原之。¹⁰⁴

這是他任職穎上知縣時事，故事中的凍卒可憐，屠隆先是以絮衣燎火解決了凍的問題，第二天，在監司發怒時，他又以放免凍卒、自己待罪的方式，解救了他們。在這兩則故事中，屠隆將自己從儒者、縣令，化身為俠者。

屠隆對於自己能在百姓之前化身為俠者，相當自豪，他也在〈與李觀察〉信中剖析自

¹⁰² 屠隆：《鴻苞》，卷 42，頁 35a。

¹⁰³ 明代文獻中有巡河御史、治河都御史，未見治河御史。且青浦屬於南直，南直應由操江都御史管轄兼巡江事，治河御史大舸到本縣，疑非公事。又，屠隆所言之事，發生於萬曆 7-10 年，年份地點確定，但當事人之某御史未能查出，殊為歉歉。

¹⁰⁴ 屠隆：〈凍卒〉，《鴻苞》，卷 47，頁 45a。

己的這種性格：

處家不治生產，問以妻孥之年，童僕之數，米鹽之有無，皆不能舉，室後構一小樓，皆婦為之，自初創以至落成，某未嘗一寓目焉。遇寒而衣，遇饑而食，織紉、井相、竈突，經年而不一至其處。有僕夫在某家三年，人試問以姓名，茫然也。有金錢畀入，恣其出入，報盡即已，不誥其數也；時人並目之曰疏。然其為令，黔首之至于前，一目輒不忘，又能舉其父母妻子昆弟，記其室廬，知其隱事，事關民瘼，終夜而思之。一夫入于犴狴，一人絀于法網，一事未竟，一錢未明，無時不往來于胸中，必了此而後朝食，又雅類不疏。¹⁰⁵

「處家不治生產……時人並目之曰疏」是私人生活態度；「然其為令……又雅類不疏」是任職潁上、青浦兩任知縣時，對待所部人民的態度，屠隆以直接的對比來說明自己性格中的俠氣。除此之外，屠隆在《鴻苞》中還列舉了不少具體的為政事蹟，或是路見不平代貧苦婦人申冤之事。

（二）俠客與馬

從古代的歷史、從樂府詩傳統來看，俠客形象，都與馬有關。

騎馬必須坐直在馬鞍上，不是輕鬆的事，以屠隆每日所行的里數之多，每日在馬上的時間應該很長。如前所述，屠隆是習慣夜間生活樂趣的文士，並不是壯健之夫，而且，在他第一次北征以前，接觸馬匹的機會不多，並非慣於馳騁的騎士。像這樣長時間的騎乘，實在是苦多於樂，但他樂而不疲。推其原因，他是由衷喜愛的在享受著騎行所帶來的俠客風情。

下面這段文章，充分可以看到這種心情，這是〈北征記〉中的一段，寫冬夜四鼓騎馬曉行，地點在臨淮縣：

是時積雪載塗，山林阬谷間，深數尺，騎時時蹶。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晶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沛寥空闊，馳數十里無人煙，而或遙聞騎雜沓來，弓刀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

¹⁰⁵ 屠隆：《白榆集》，文卷9，頁20a。

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徐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衣，緩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悰，往往使人淒絕矣。¹⁰⁶

明代驛馬分上馬、中馬、下馬，¹⁰⁷屠隆此行北上赴試，不能使用驛馬，不過，官馬既分三等，民間租賃業者，也應該有三等分級，所以文中說：「屠子騎頗駿，宵行，常獨先，奴不能從」，意即自己所騎的是上馬；他僅有一奴同行，所騎的馬追不上自己。屠隆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有幾分豪情，接下來寫所經的地形是大麓長阪，俠氣更多。這一天應是1月11日，是進入立春的第三日，一更長148分鐘，夜四鼓起身，飯罷，大約凌晨兩點多，距離天明還有四個半小時以上，殘月早已西落，因此，「天色昏黑，沆寥空闊」「嚴霜被髮，殘星在衣」，皆是實境。

文中最精采的是「遙聞騎雜沓來，……亦竟舍之馳去」這一段，來騎不止一組人馬，並且帶有弓刀。第一次不交一語而過時，屠隆沒有交待對方身分，讀者或疑有危險。第二次，屠隆被嚴厲盤問，他徐徐抱手為禮，回答為書生耳。讀至此，才知道弓刀之聲甚厲的，原來是巡邏警隊。接著又寫緩鞚行吟的清興，懸疑緊張與清冷高雅之致，兼而有之。來客的裝束、兵器的恐怖、斥問的響聲、對答的自信，都很有俠客行的趣味。明代地方警備擁有的弓兵不多，地方級每巡檢司約5-15人，¹⁰⁸也只有他們能夠公然攜帶弓刀，這些馬客，接近才知是夜巡者，但如果是綠林之客呢？屠隆的大膽與任俠，於焉可見。

屠隆對這次騎馬經驗，深為懷念，隨又寫了一首〈臨淮曉發〉詩載其事云：

行邁一何早，驅馬出郭門。馬乏踐嚴霜，北風厲寒原。時方屬青陽，褐衣苦不溫。側身望四際，煙沙莽相屯。落月白無色，天星麗以繁。山川曠蕭條，霜露空草根。何人驅馬來，疾如流泉奔。但各東西馳，不復交一言。傷哉行路難，逝矣勞心魂。¹⁰⁹

「行邁一何早」即前文「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文中用夜字，而詩用早字，並不衝突。時刻制度中，四鼓是夜；至於實際生活，人已睡醒，意中為早為曉，都是古人詩文中常見的字法。「青陽」指春日，節氣已入立春，故云「時方屬青陽」。「落月白無色，天星麗以繁」，謂月亮已落，不復清光生色，與〈北征記〉之「天色昏黑」，「殘星在衣」相同。「但

¹⁰⁶ 屠隆：《由拳集》，卷18，頁15b-18a。

¹⁰⁷ 明·李東陽奉敕撰：〈水馬驛上〉，《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91冊，卷145，頁5b：「各驛馬匹須分上中下三等，馬膊上懸掛小牌，寫明等第，憑符應付。」

¹⁰⁸ 見明·易時中修，王琳纂：《夏津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57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據明嘉靖十九年刻本影印），卷2，頁25。

¹⁰⁹ 屠隆：《由拳集》，卷4，頁12a。

各東西馳，不復交一言」，即文中「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矣」。屠隆這時期服膺復古派，用漢魏格法的五古體裁作了這首詩，自己想必很滿意。

馬背上的屠隆風姿，究竟是不是能如燕趙悲歌之士呢？同在〈北征記〉的後幾日中，他還紀錄了一次也很大膽，也是早行，卻在山谷中迷路之事：

質明，冒雪北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大都莽蕩之野。

一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且十數里。山路窄絕，無一人影馬跡，不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鬼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幸以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決起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焉。¹¹⁰

上文由兩個事件組成，「質明，冒雪……大都莽蕩之野」，應在徐州北，經利國驛，到滕縣臨城驛（今棗莊市薛城區）之間。質明，是夜刻結束，晝漏初上那段時間，空中蒙光漸明，太陽未上地平之前。此時天上還下著雪，北風強勁，自己冒雪馳行，四野遼闊。「一日，宵行山谷中，……尋亦自悔焉」，是另一日，應該已經到了鄒縣南方的嶧山一帶丘陵。北出徐州，都是平原，只棗莊市東郊有小山，不當驛路。必須過界河驛之後，進入嶧山，才是山區，趨北就入鄒縣（今鄒城市）、兗州。屠隆把前後不同時間發生的事情排列在一起，應是為了文章的氣勢，讓類似的經驗互相生色。

宵行山谷這一段，他天未明即出發，仍舊是一人一馬領先僮僕，卻在山中迷途。由於出徐州利國驛時還冒著飛雪，到此雲層仍厚，星月無光，一片暗黑，就發生了文中所述的異事。「山鬼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固然是孤身在黑暗中的恐懼，「一巨物決起過前」，讀者可能會認為是錯覺，對屠隆卻有不同的意義，因為他常常看見異象，在迷路時，他大概真的以為是神怪。

屠隆對「魔、鬼、怪」相當有感應，在《鴻苞》中，他不但記錄親身遇魔的經驗，還有〈鬼侮〉篇記錄友人沈君典和石星遇鬼經歷。¹¹¹〈魚言〉篇夢見自己和魚對話，因為聽不懂魚所說的浙江特殊方言，還請母親來翻譯。¹¹²他親身遇魔的事，在〈鬼神〉篇寫過之後，又在〈魔事〉篇重記一次，下面請看〈鬼神〉篇的內容：

¹¹⁰ 屠隆：《由拳集》，卷18，頁15b。

¹¹¹ 屠隆：《鴻苞》，卷42，頁44a。

¹¹² 屠隆：《鴻苞》，卷42，頁20a，以下四條都是記異，至於《冥寥子遊》下卷末：「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容艷態而窺於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瞥然不見。為鬼狐，為魔試，皆不可知矣。」此雖託言自己所遇見，其實僅僅是寓言而已。

余在青浦時，以公事入郡，寓郡城隍祠。五月望夜，閒居無事，令童子執燭散步祠前，月色甚朗。少選就榻，甫解衣即仆於牀程，魂離殼而出，顧見其形骸。心念不貪生不怖死，吾挾所學，今符到即行，何貪怖之有？……忽目光中見一大神，金冠絳袍，赤鬚頰面，身長丈許，立余前。余作念：「我之所以死者，此物為之也。以我之為人與作官而賊殺之，是非正神，必邪鬼也。邪鬼又何懼焉？」神忽生風雷，穿屋而去。良久乃甦，頭岑岑然，神氣憤懣不能起，內以定力持之，已，稍熟寐。天明，侍兒排闥入，余時氣息尚微，徐問夜來頗覺有異乎？侍者云：「昏時三人宿房前，纔就枕，忽聽屋上有風雷穿窗而過，甚厲。三人者怖欲死，脅息不敢動。」余始驚吒是厲聲者，不惟余聞之，他人咸聞，非復夢境明矣。此鬼神之事，余所目擊身經，最章明較著者也。¹¹³

此為萬曆9年5月16日夜（1581/6/16），這一年戶部奉旨，令各省清丈田畝，縣令必須下鄉丈量，屠隆也為丈田事入郡城（松江府華亭縣）造冊，因而在松江府城隍廟夜宿遇魔。因為屠隆自述為「目擊身經」，所以故事真偽不必考慮，重點在他怎麼應付「魔」。首先，他心中持定「非正神，必邪鬼也，邪鬼又何懼焉」之念，魔就走了。然後，他再用「內以定力持之」的方法，保護自己。這種抗魔的方法，又見於〈學道有魔〉篇：「大修行人入流證聖，發真歸元，則魔宮震動，是故不利於魔，魔乃欲來擾亂，邪正不兩立也。……魔事之來，心如山岳，不動不認，彼何能亂。」¹¹⁴〈獄鬼〉篇還記載：青浦獄中驟有鬼物擾亂獄囚，囚有因而斃者，屠隆的辦法是，先「為文以諭獄神」，然後自己親自「身坐獄至夜分」，結果鬼就走了。¹¹⁵

〈北征記〉寫成在前，《鴻苞》寫成在後，但松江城隍廟遇魔之事，與是日的驚魂，相隔不到五年，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不會相差太大。文中「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決起過前」，在現代科學解釋下，也許認定是暗黑產生的目視與心理錯覺，屠隆卻信其有魔，便是前述的夙因使然。真偽既不是重點，重點在他的應變方式，是「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劍代表了俠客，少陵詩代表了正氣，不為動則是屠隆很得意的「定力」和「心如山岳」。因此，這一個凌晨的遭遇雖然恐怖，正好讓屠隆又一次像唐吉訶德般展現了俠客之風。

除了俠客的風情，一般的騎行趣味，屠隆也寫得簡潔動人，如〈發青谿記〉所載晚過德州時所見：

¹¹³ 屠隆：《鴻苞》，卷42，頁38a。又，〈魔事〉見屠隆：《鴻苞》，卷38，頁38a。

¹¹⁴ 屠隆：《鴻苞》，卷38，頁36。

¹¹⁵ 屠隆：《鴻苞》，卷42，頁52a。

初九日至德州，城郭雄壯，人物繁華，北方一大州也。出郭，渡浮梁，走馬河濱，風色向微，煙沙不起，垂鞭而觀落日。少頃，月作半圭，¹¹⁶挂枯楊樹上，柴門未掩，牛羊歸來。客投前村，馬蹄甚疾，比及解鞍，肆中懸燈待客矣。¹¹⁷

文中的初九日，乃12月9日（1583/1/2），屠隆進入德州城，日尚未晚，乃出郭繼續前行，繼而看見落日，繼而看見接近半圓的明月，繼而急行到前村客棧投宿，主人已經懸燈待客，都是目前事境，無一用典和虛飾，簡潔空淨而有清興，這是在俠氣之外的輕鬆景況。

綜上所見，屠隆務實、放縱、愛人、使奇、好古的性格，自然凝聚出一段對長途騎馬旅行的興趣，況且，長程騎馬使他積塞在心中的俠氣，可隨高速馳行的運動量，全部宣洩出來，這應是他一再選擇陸行，甚至以日行一百八、九十里的速度，飛馳 16.5 個在途日的緣故。最後，我想以屠隆的一句詩來形容他自己，就是〈寄顧益卿〉的：

我本要離俠者儔。¹¹⁸

六、結論

屠隆是晚明形象的先期人物之一，萬曆 12 年他從禮部主事削籍斥歸，對他的影響之

¹¹⁶ 「半圭」難解，因圭本長方形，半圭為璋，亦為長方之形。屠隆兩次用「半圭」，一次用「半珪」，圭珪通用。本文所引二次，同指半圓之月，另一次為屠隆：〈明月榭賦〉，《白榆集》，卷 1，頁 1a：「初隱岫而半珪，漸溶溶而出匣」，指十五之月，升上東山，初露半月，繼而全見。按：「半珪」一詞，初見於北宋天禧 1 年，陝西轉運使梅詢〈宿山祠〉詩：蒼蒼千仞接煙霓，磴道微茫桂栢梯。蘿月半珪山未曙，洞房清唱有仙雞。」見萬曆 29 年劉九經、劉本唐撰，萬曆《鄆志》。該志校注標點本，在眉縣政府〈眉縣地方志辦公室〉網站有全文，可供檢索，網址：http://www.mxdadq.cn/l2_6/201401/t20140120_43274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11.08）。又據「基本古籍庫」所收錄，自唐至明，以半圭寫月的只有屠隆，以後便是清代詩文中的十餘例，如清·洪亮吉：〈遊消夏灣記〉，《洪亮吉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更生齋集》文乙集，卷 1，頁 1061，云：「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月正半圭，花開十里。」是也。或疑為「圭」為「規」之同音假借，考北宋·黃庭堅撰，南宋·史容、任淵注，〈次韻奉送公定〉：《山谷外集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 111 冊）卷 2，頁 33b，云：「屯雲塞六幕，新月吐半規。」典出韓愈：〈玩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秘書至〉，《全唐詩》，卷 342，頁 3837：「前夕雖十五，月圓未滿規。」則「規」字取圓規之義，或亦可通。但屠隆也用了「珪」字，從玉部，明非「規」字之同音借用。可能是因為從《詩經》、《周禮》、《禮記》以來，古籍中「圭、璧」連用十分常見，璧形本圓，或因而借「圭」字代「璧」，從嚴格的用字來說，雖屬誤用，但在古人詩文的造詞法中，非不可能，故僅僅有少數人用半圭、半珪以狀月。

¹¹⁷ 屠隆：〈發青谿記〉，《白榆集》，文卷 5，頁 11a。

¹¹⁸ 屠隆：《由拳集》，卷 6，頁 17a。本詩有序，云：「余出都門，顧觀察益卿追送報國寺，相與劇談，沈酣達旦，平明別去，賦此寄之。」報國寺在北京，毗盧閣即報國寺之閣，此詩作於萬曆 5 年出京時。

大，吾人簡直無法想像。本文所討論的，是他在遭逢巨變以前的行事與心性。他出身四明世家，屬於廣義的江南士人，卻喜愛長途騎馬旅行，甚至在萬曆 11 年 7 月，以 18 天的極短時間（在途 16.5 日）從丹陽吳大帝陵口馳馬進入北京，絕對不是沒有意義的事。本文解說其行程始末，論證其身心特質，為明代文人与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觀察側面。

以下是兩點結論：

第一，屠隆提供了準確的大運河平行陸路的參考日程

明代大運河的航行日程，已經有多家旅行詩文，提供了逐日的紀錄，至於大運河平行陸路的資料，則非常缺乏。除了僅載驛名及里程的《寰宇通衢》、《一統路程圖記》之外，屠隆詩文是目前所見最豐富的材料。本文第二、三兩節，以大運河現地研究為基礎，將屠隆往返北京與江南的旅行詩文，仔細作了的整理，還原他所經由的路線、日程、里數，不但可以使讀者更貼身去瞭解屠隆，這一套準確的大運河平行陸路的參考日程，也可以用於其他明人大運河詩文的詮釋。

第二，屠隆為晚明文人形象提供了一個正向放縱的樣本

關於晚明文人，談論的人已經很多，本文利用屠隆這次事件，提出一個全新的討論方式：就是以屠隆本人的身體行為，來觀察屠隆的心志意念。從具體證據顯示，屠隆關心地理知識，在這次旅行之前，也有兩次陸路入京的現地經驗，使得他的空間意識十分清楚，在出發之前，便有充分掌握全程的自信。因此，這次的快速旅行，並非盲目地趕路，而是對他的身體，作一次有意識的跨越極限的挑戰。

從心理層面來說，我覺得用「放縱」來形容更為貼切。屠隆的放縱是正向的放縱，他敢於穿透時代的局限，敢於書寫自己的色慾，敢於暴露自己的妻子，敢於放縱自己徹夜不睡去做喜愛的事。所以，一般人不能的事，他才敢於去挑戰。這次旅行，更是他對自己身體的絕對放縱。同時，不能忽略屠隆一再寫下在潁上和青浦兩任知縣中，憐恤小民，對抗高官與鄉紳勢力的文字；在紀遊詩文中，也自言不忍乘輦而重勞輿夫。身為儒者的屠隆，希望自己擁有持正與愛人的俠客之心，也喜愛據鞍顧盼的俠客形象，長途的高速馳行，放縱自己於俠客想像中，正符合他的為人趣味。從這一點來看屠隆，才可以真正認識屠隆。可惜的是，屠隆罷官以後，意氣蕭索，便不再作類似的旅行了。

最後，談到現地研究，它雖然是致力取得山川地理實證的研究，而核心工作，仍是「人」的研究。以本文為例，在清楚的解說了屠隆於實際山川的經歷之後，便可以形構出屠隆的為人，包括他的空間意識、地理知識，與放縱地使用自己身體和任俠性格。如果沒有現地研究的前端基礎，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Si, Ma-qian(Author). *Shi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Li, Ji-fu(Chief Editor);He, Ci-jun (Note and Commentary),*Yuan He Jun Xian Tu 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北宋·黃庭堅撰，南宋·史容、任淵注：《山谷外集詩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收入《四部叢刊續編》集部第111、112冊。【Huang, Ting-jian (Author); Shi, Rong, and Ren, Yuan (Note and Commentary) . *Shan Gu Wai Ji Shi Zhu*.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66, in *Si Bu Cong Kan Xu Bian*, Ji Bu, vol. 111-112】
- 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Li, Tao(Author).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 南宋·劉一清：《錢塘遺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據掃葉山房本影印）。【Liu, Yi-qing (Author). *Qian Tang Yi Sh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hoto-offset of *Sao Ye Shan Fang*】
- 明·王錫爵：《王文肅公全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5、136冊。【Wang, Xi-jue(Author). *Wang Wen-su Gong Quan Ji*.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135-136】
- 明·沈一貫：《敬事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63冊。【Shen, Yi-Guan (Author). *Jing Shi Cao*.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2005,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Shi Bu, vol.63】
- 明·沈明臣：《豐對樓詩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4冊。【Shen, Ming-chen(Author). *Feng Dui Lou Shi Xuan Ji*.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144】
- 明·李東陽奉敕撰：《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91冊。【Li, Dong-yang(Chief Editor). *Da Ming Hui Dia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Shi Bu, vol.791】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Li, Shi-zhen(Author). *Compendium of*

- Materia Medica*. Beijing: People's Health Publishing House, 1975】
- 明・李開先：《閒居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2、93 冊。【Li, Kai-xian(Author). *Xian Ju Ji*.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92-93】
- 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Li, Xian(Chief Editor). *Da Ming Yi Tong Zhi*. Taipei: Wen Hai Press Company, 1965】
-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55 冊。【Wu, Kuan (Author). *Hu Weng Jia Cang Ji*.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96,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Ji Bu, vol.1255】
- 明・明太祖敕編：《大明律例》（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江西布政使司重刊本）。【Ming Tai Zu (Chief Editor). *Da Ming Lü Li*. Library collection i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Fu-ssu Nien Library. The 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ar of Jiajing Emperor(1554)】
- 明・明初不著撰人：《寰宇通衢》（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66 冊。【Bu Zhu Zhuan Ren. *Huan Yu Tong Qu*.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 Bu, vol.166】
- 明・易時中、王琳等纂，《夏津縣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年），《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57 冊，據明嘉靖十九年刻本影印。【Yi, Shi-zhong; Wang, Lin(Chief Editor). *Xia Jin Xian Zh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63, in *Tian Yi Ge Cang Ming Dai Fang Zhi Xuan Kan*, Ju Ming Jia Jing Shi Jiu Nian Ke Ben Ying Yin, vol.57】
-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Yuan, Zhong-dao (Author); Qian, Bo-cheng (Note and Commentary). *Ke Xue Zhai 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明・陸深，《南遷日記》，（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27 冊。【Lu, Shen (Author). *Nan Qian Diary*.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 Bu, vol.127】
-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Chen, Zi-long (Chief Editor). *Ming Jing Shi Wen B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明・張佳胤：《居來先生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1 冊。【Zhang, Jia-yin (Author). *Ju Lai Xian Sheng Ji*. Jinan: Qi Lu Shu She, 2001,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u Bian*, vol.51】
- 明・屠隆：《由拳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0 冊。【Tu, Long (Author). *You Quan Ji*.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 Bu, vol.180】
- 明·屠隆：《白榆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80 冊。【Tu, Long (Author). *Bai Yu Ji*.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180】
- 明·屠隆：《栖真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60 冊。【Tu, Long (Author). *Qi Zhen Guan 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Ji Bu, vol.1360】
- 明·屠隆：《鴻苞》（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8-89 冊【Tu, Long (Author). *Hong Bao*.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Zi Bu, vol.88-89】
- 明·黃汭：《一統路程圖記八卷》，（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66 冊。【Huang, Bian (Author). *Yi Tong Lu Cheng Tu J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 Bu, vol.166】
- 明·黃汭著，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Huang, Bian(Author); Yang, Zheng-tai (Note and Commentary). *Tian Xia Shui Lu Lu Cheng*. Taiyuan: Shan 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2】
- 明·黃潤玉：《（成化）寧波府簡要志》（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第 174 冊。【Huang, Run-yu (Author). *Cheng Hua Ning Bo Fu Jian Yao Zhi*,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Shi Bu, vol.174】
- 明·楊士奇：《東里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39 冊。【Yang, Shi-qi (Author). *Dong Li Xu Ji*.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96, in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Ji Bu, vol.1239】
- 明·楊洵、陸君弼：《萬曆揚州府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5 冊，（影印萬曆癸卯刊本）。【Yiang, Xun and Lu, Jun-bi (Chief Editor). *Wan Li Yang Zhou Fu Zhi* (Series of Rare Ancient Books), vol.25.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hoto-offset of Wan Li Gui Mao Kan Ben】
- 明·趙明廷：《南滁會景編》（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集部第 300 冊。【Zhao, Ming-ting (Author). *Nan Chu Hui Jing Bian*.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330】
- 明·趙維寰：《雪廬焚稿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88 冊。【Zhao, Wei-huan (Author). *Xue Lu Fen Yu Gao*. Beijing: Beijing Chu Ban She, 2000,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vol.88】
- 明·鍾惺撰，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Zhong, Xing(Author)；

- Li, Xian-geng (Note and Commentary). *Yin Xiu Xuan 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明・謝肇淛：《小草齋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5 冊。【Xie, Zhao-zhe (Author). *Xiao Cao Zhai Wen Ji*. Jinan: Qi Lu Shu She, 1996,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Ji Bu, vol.175】
- 明・歸有光著，周本淳點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Gui, You-guang (Author). Zhou, Ben-chun (Note and Commentary). *Zhen Chuan Xian Sheng J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明・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Gu, Yan-wu(Author). *Ri Zhi Lu*. Taipei: Wen Shizhe Press, 1979】
- 清・毛文煥增補：《增補萬寶全書》（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1739）世德堂刊本）。【Mao, Wen-huan(Zeng Bu). *Zeng Bu Wan Bao Quan Shu*. Library collection in America: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ar of Chianglong Emperor(1739)】
- 清・朱軾等奉敕修：《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Zu, Shi(Chief Editor). *Qing Shi L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清・汪師韓：《孫文志疑十卷》（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 12 年叢睦汪氏遺書刻本）。【Wang, Shi-han(Author). *Sun Wen Zhi Yi Shi Juan*. Library collection in Taipei: Academi Sinica Fu-ssu Nien Library. The copy of the block print edition in ear of Guengxu Emperor(1886)】
- 清・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5 冊。【He, Shen (Chief Editor). *Da Qing Yi Tong Zhi*.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2005,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vol.465】
- 清・清高宗敕撰：《續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Qing Gao Zong (Chief Editor). *Xu Tong Dian*.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7】
- 清・崑岡等奉敕纂：《大清會典事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98 冊。【Kun, Gang(Chief Editor). *Da Qing Hui Dian Shi L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Shi Bu, vol.789】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Peng, Ding-qiu(Chief Editor). *Quan Tang 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清・穆彰阿、潘錫恩等：《嘉慶重修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收入《四部叢刊續編》。【Mu, Zhang-a and Pan, Xi-en(Chief Editor). *Jia Qing Chong Xiu Yi Tong Zhi*.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7, in *Si Bu Cong Kan Xu Bian*】

近人論著

-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Yang, Zheng-tai. *Ming Dai Yi Zhan Kao Zeng Ding Be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臺灣開明書局:《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91年)。**【Taiwan Kai Ming Shu Ju. *Duan Ju Shi San Jing Jing Wen*. Taipei: Taiwan Kai Ming Shu Ju, 1991】**
- 簡錦松:〈唐孫樵〈興元新路記〉江口鎮以北路段之現地研究〉,《國文學報》第50期(2011年12月),頁209-244。**【Chien, Chin-sung. “Sun Qiao “Xing-yuan xin lu Ji” in Tang Dynasty On-site Studies on the Road of North from Qing-song yi”, *Bulletin of Chinese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vol.50, 2011. 12, pp. 209-244】**
- 朝鮮·崔溥著,葛振家注,《崔溥《漂海錄》評註》(北京:線裝書局,2002)。**【Cui, Pu (Author); Ge, Zhen-jia (Note and Commentary). *Cui, Pu Piao Hai Lu Ping Zhu*. Beijing: Xian Zhuang Shu Ju, 2002】**
- 義·利瑪竇著,何濟高、王遵仲、李申譯:《中國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Matteo Ricci (Author); He, Ji-gao; Wang, Zun-zhong and Li, Shen (Translator). *China Trave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Space, On-Site, Disposition——A Profil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Presented by Tu, Long's Riding a Horse to Capital

Chien, Chin-sung

(Received June 27, 2016 ; Accepted September 30, 2016)

Abstract

Tu, Long, one of the early figur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once rode a horse from Wudadi Lingkou, Dantu, Jiangsu to Capital within only 18 days in July, Wanli 11th year. Based on Grand Canal on-site researches and Tu's exact journey path and schedule, this paper depicts Tu's journey. Not like people in Ming Dynasty travelling between Jiangnan and Capital mostly by boat on Grand Canal, Tu rode to Capital which was an unprecedentedly high-speed in Ming. Tu's characteristic introduced from this act offers a new and detailed example for the study on literati and literature in late Ming Dynasty.

Keywords: Tu, Long, Grand Canal, Space, On-site Research

